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刊
总第十四期



2017.12

Contents

目 录

研究与探索

- 4 弘扬宋庆龄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郑培燕
12 建国后宋庆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初探 符朋

宣教论坛

- 17 浅谈博物馆讲解艺术的重重境界
——“信”、“达”、“雅” 杭 垚
22 科学管理 主动出击
——2017年普通高中社会实践工作札记 高海涛

陈展天地

- 25 知音雅汇
——宋庆龄、周小燕、蒋英珍藏唱片展参展记 麦灵芝
28 “风雨同舟五十载”文物史料展
——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宋庆龄的革命情谊 王建国

馆藏研究

- 34 托彭舞面具考 宫洁菁
38 一张老照片记中西女塾校舍之变迁 费佳
42 馆藏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致宋庆龄感谢信浅考 葛伟峰

文保之道

- 46 宋庆龄使用过的摩利臣钢琴养护纪实 王宁宁

馆建工作

- 51 关于演示文稿的二三事
——简析演示文稿的发展轨迹 许毅捷
- 55 基于“小小演说家训练营”活动
对故居类场馆开展同类型未成年人教育活动的思考 高雨寒

藏书选译

- 59 《索尼娅的报告》选译 张黎 译 符朋 摘录

资讯快车

- 00 故居新闻

图版

- 宋庆龄收藏的路易·艾黎著作

弘扬宋庆龄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撰文 / 郑培燕

摘要：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者，一生始终保持昂扬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始终坚持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以人民的幸福为最终奋斗目标，并将爱国主义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相统一，朝着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努力奋进。作为中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宋庆龄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宋庆龄 中国精神 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展览《复兴之路》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预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不懈奋斗，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便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宋庆龄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历史时期，毕生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她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一系列光辉思想，不断地自我革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她一生顽强奋斗的革命实践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回顾和总结她的奋斗历程，学习和弘扬她的光辉思想和精神，无疑对我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宋庆龄是“中国精神”的杰出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诚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之魂。自古历代圣贤在各自的传世经典中对中国精神的内涵都有精辟的阐释。而宋庆龄，以她七十余年的奋斗生涯，证明了她无愧为“中国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爱国主义是她坚强而永生的根”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她一生思想和革命实践的起点和原动力，也是支持她为了实现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力量。

自青年时代起，宋庆龄便显示出对祖国的炽热情感，显示出对悠久的中华文明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热爱，显示出对中华民族强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社会危机严重，人民苦难深重。她时刻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并立下了复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当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宋庆龄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指出“中国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并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一旦中国醒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1]。文章洋溢着浓郁的民族自豪感和充沛的爱国热情，相信中国必将对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始终贯

穿于宋庆龄一生的革命与实践活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处于极度低潮的时期，宋庆龄毅然选择献身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的伴侣、学生、助手和战友，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爱国并愿努力救国的志向。她曾说：“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使我很悲伤，但我坚信真理永存，并且坚信我们终究会看到中国重新得到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做出她自己的贡献”^[2]。此后，她追随孙中山先后进行护法运动、护国运动，并在陈炯明叛变事件中为掩护孙中山脱险而置生死于度外，因为她坚信孙中山是拯救中国的希望，充分展示了为国家复兴不惜牺牲自己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也正是这种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支持她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支撑她在孙中山逝世以后，继承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志，捍卫孙中山的思想和未竟的事业。

抗战时期，宋庆龄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中华民族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她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表示，“高度的爱国主义起来代替了军事割据，使国家有了精诚团结的希望”^[3]，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将更大地激发中国民族精神的显著成长，“保卫绥远的胜利就

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有意义的证明。为了使爱国主义的火焰继续增长，绥远抗战的事迹必须予以宣扬”^[4]。事实上，宋庆龄也是这么做的。她倡议中国妇女组建抗敌后援会，呼吁华侨“俱有国家观念，勇于抗战救国”^[5]，组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不仅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抗战宣传，还募集大医药物资和款项支援抗战军民，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宋庆龄以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热情，投身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忘我工作，无怨无悔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始终是宋庆龄前进的精神动力。正如宋庆龄的好友爱泼斯坦所言，“她无比热爱和尊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坚强和永生的根”^[6]。

（二）“跟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

邓颖超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宋庆龄这个名字，象征着自辛亥革命以来七十年革命的历程”^[7]。在这七十年奋斗生涯中，宋庆龄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以爱国主义为起点，跟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并将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相结合，实现了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期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中即认为留学生到外国去的目的，是要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带回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8]。

在与孙中山共同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宋庆龄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且深得孙中山自我更新精神的精髓。宋庆龄曾经这样描述孙中山：

“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探索，寻找引向革命胜利、中国获得解放以及使中国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人民得到自由的道路”^[9]。“寻求中国革命的关键时，他严格地要求自己革新……在他亲历的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中总是站在进步方面……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家所面临的每一个新的任务”^[10]。也正是这种自我更新精神指引着宋庆龄在寻求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空前严峻的考验面前，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捍卫者，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始终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30年代初期，宋庆龄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并在继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目标实现之后，踏上了为共

产主义奋斗的征程。

可以说，自献身革命起，宋庆龄的思想便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坚持真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探索，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显示了鲜明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宋庆龄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

宋庆龄的好友爱泼斯坦曾这样描述：“对于宋庆龄而言，国家就是人民，就是广大的劳动大众”^[11]。爱祖国是宋庆龄献身革命的起点，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宋庆龄毕生的终极价值追求。

在美国读书时期，宋庆龄的理想是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之后，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其内涵，认同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后归宿，认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是“提高人类和群众的物质享受”^[12]，认同推行三大政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因此，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达到改善民生的最终革命目的成为他们共同的理想。她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13]。在此后的革命

斗争中，宋庆龄不断探索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对民生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加坚定了捍卫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为众生谋幸福的理想信念。

本着这一信念，她义无反顾。不论是抗战时期的“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求得世界大同与和平”^[14]，“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15]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号召“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16]，主张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7]，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民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享受幸福生活”^[18]。她说：“道路漫长而艰险，但是，让普通人进步、富裕、高尚、接受教育，始终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此坚定不移，并为之奋斗”^[19]。

由此可见，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宋庆龄为之奋斗的主要任务各有侧重，但最终的价值归宿都是为了实现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理想，这与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

三、“一向支持党，同人民在一起”是宋庆龄毕生奋斗的成功经验

在为创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奋

斗的生涯中，宋庆龄始终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坚定地同人民在一起，并将“为人民服务”^[20]作为自己的一贯立场。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宗旨是一致的，从而使得宋庆龄自接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之后，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并在新中国创立之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永远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

宋庆龄的美国友人海伦·斯诺曾在文章中写道：“宋庆龄政治信仰的‘神秘’在于永远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她从不因他们的软弱而懊丧。她终身的努力是为帮助他们觉醒，她对人民的尊敬是真诚的而并不自居为恩人，……她对他们（人民）有信仰”^[21]。

诚然，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宋庆龄都坚信人民的力量必胜。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中扶助农工的内涵加以丰富和发展，认为“工农阶级是我们力量的基础，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22]。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相信“虽然国民党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着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23]。她“代表中国革命群众”前往莫斯科，去说明中国“在表面的混乱

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24]。在宋庆龄看来，虽然反动派的势力扩张了，但是中国的人民已经觉醒，懂得“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是不会失败的”^[25]。

抗战期间，宋庆龄主张发动群众，主张给人民更多的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国家的事务，激发人民的爱国救国热情。宋庆龄始终“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26]

在新中国的建设实践中，宋庆龄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有无比力量，磅礴的生命力和卓越的天才，有了这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和困难”^[27]。新中国诞生30周年之际，宋庆龄撰文回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的巨大作用，忆及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时的情景，宋庆龄写道：“我从那里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正是凭着这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中国才出现于世界之林”^[28]。

正如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宋庆龄的好友史良在回忆中所写的，“坚信人民的大多数，坚定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是宋庆龄毕生的信念”^[29]。

（二）“愿意赴汤蹈火跟着党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得困

顿中的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宋庆龄极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之后，宋庆龄认识到国民党已不再是“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30]，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31]。

此后的岁月中，本着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共识，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许多重大关键性历史问题上都能够达成基本一致，并以崇高的威望和特殊的身份地位，与“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32]共产党亲密合作，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宋庆龄始终坚信，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33]，是胜利实现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最可靠保证。宋庆龄也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贫困和落后的唯一办法，是我国在国际上独立与尊严的唯一保证”^[34]。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宋庆龄“愿意赴汤蹈火跟着党走”，因为“它将引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的新胜利，

在团结全世界一切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新胜利”^[35]。宋庆龄还鼓励青年一代“跟着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有任何的犹豫、怀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的前途”^[36]。

宋庆龄曾对史良说，“中国共产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37]。而这也正是宋庆龄毕生努力奋斗的写照，她热爱人民，始终代表人民说话，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毕生终极价值，从而最终选择了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并且矢志不移，无言无悔。刘少奇曾如是总结说，“历次关键时刻，宋庆龄一向支持党，同人民在一起，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一些党的负责同志”^[38]。

四、弘扬宋庆龄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在当前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宋庆龄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始终贯穿于她的思想和实践，也深深地融入了她的身心。她所代表的这种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弘扬的精神动力，是团结和鼓舞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进我们向着梦想努力迈进的巨大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仅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还需要众志成城的力量。宋庆龄一生始终以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始终坚信人民的力量必胜的宗旨和立场，为我们凝聚中国力量，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指明了方向。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宋庆龄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将爱国主义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革命实践，是她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为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将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了经验借鉴。

让我们学习和弘扬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精神，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1]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 [2]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 [3]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92页。

[4]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5]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6] 肖英：《与人生握手——中外杰出人物访谈录》，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9页。

[7] 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第1版。

[8] 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上，1893-194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9]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5页。

[10]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

[11] 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2页。

[12]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1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4]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15]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

[16]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1页。

- [17]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 [18]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 [19] 《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3页。
- [20]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25页。
- [21] 《时代文摘》，1947年，第2卷，第3期，第33页。
- [22]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 [23]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 [24]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 [25]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 [26]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 [27]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0页。
- [28]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6页。
- [29] 史良：《人民的事业必胜——沉痛悼念尊敬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
- [30]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 [31]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页。
- [32]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
- [33]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8页。
- [34]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2页。
- [35]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2页。
- [36]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11页。
- [37] 史良：《人民的事业必胜——沉痛悼念尊敬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
- [38]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3页。

建国后宋庆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初探

撰文 / 符朋

摘要：宋庆龄，其一生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伟大历程紧密相连。建国后，她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外交、政治、经济、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关于现代化的建设性思想，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又兼具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值得被后人珍视。

关键词：宋庆龄 建国后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

几个世纪以来，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一直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目标与理想。在刚刚开幕的党的十九大上，习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指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将用两个15年分阶段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之路仍将继续，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了探索，初步设计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战略步骤。宋庆龄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言论自然不在少数，这其中不乏一些科学的构想和精辟的言论。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对国际环境在认识上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军事包围的威胁措施，而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二战后迅速强大，与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新中国为了恢复经济、稳固政权，审时度势，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三大政策，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此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建国初前中国先后与苏联等17国建交，摆脱了外交上的孤立无援。

宋庆龄这时期外交思想基本上与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一致，主张与苏联建

交。她在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的开幕式致辞中提到“只要两万万苏联人民和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携手合作，英勇斗争，任何反动黠武的帝国主义者，一定会在这伟大无比的人民力量面前倒下来的”^[2]。她在发言中多次强调中苏关系的紧密性，希望中苏携手团结，为全人类的解放共同斗争。在《人民中国》1950年第二期刊载的她的论述《美苏外交政策的区别》中，她更是从美苏对待彼此盟友及美苏两种制度下社会状态两个角度展开比较，最后得出定论：“美国金融集团所领导的一帮帝国主义者，无论在他们本国和国外，都是人类进步途中的一个障碍物、绊脚石。然而苏联却向国内外在奋斗中的年轻的国家伸出了一双协助的手，直到他们能够航行前进。”^[3]她认为苏联是进步国家及被压迫国家所能倒向的唯一一边。宋庆龄对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清醒认知，让她选择了倾向苏联的外交思想，事实也证明了，这是明智的。回顾历史，建国之初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起全面合作，确立了同盟国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对于当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在中国经济恢复、困难时期，还是在国家进行工业化时期，苏联给予中国科技人才、资金、机械设备等方面的支援，的确为我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

成带来了保障。

除了倡导促进中苏友好，外交上，宋庆龄还建议扩大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好交往，倡导各国合作交流中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她在1956年1月缅甸仰光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便提到中缅两国关系之所以如此密切，与两国在经济、文化的合作交流中共同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密不可分。宋庆龄谈及与邻国外交关系中也多次强调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该原则是两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

宋庆龄在外交上倡导倒向苏联，主张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强调在外交关系建设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现代化外交思想，是当时新中国所处国际国内情形下“孕育”而出，扭转了被动的外交局面，使新中国的外交结出了丰硕成果。

二

政治现代化的根本标志是民主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特点便是人民当家作主，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国家的主人翁。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程度越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便会越强，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释放，使之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不竭的力量源泉。正因为如此，宋庆龄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便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符合国情并

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在政治方面，中共也采用同样方法，处理他们与人民的关系”^[4]，这种方法就是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民主进步人士，不论何种民族、种族、性别、党派，共聚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商国是。她评价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是“第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显然她很欣赏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的这种制度，欣赏它能够发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自觉性与主人翁意识的作用。她还指出在地方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形式是政治的进步，在1951年5月1日东北旅行印象记中她提到：除去过去的地主外，各阶层都积极地参加了政府的管理，大多数的农村都划分成若干段，每段有若干户。这些段在选举村人民代表会议时提出候选人。在选举之后，代表会议再推举一个人数较少的委员会。村政府代表会议选出区代表，区代表在选举县政府，这样推选上去一直到省政府。每级政府的主要特点，都是遇事与群众商量。^[5]她指出共和国建立初期，实行普选和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成熟，在地方由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发扬人民民主、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到政治舞台的制度支持，体现出超越旧社会独裁专制的广泛民主特质。在宋庆龄看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缺乏广泛性，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更是难上加难。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局稳定，恢复经济发展，解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便成为领导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快速摆脱落后传统的农业化国家现状，迈入先进现代的工业化国家行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中国以苏联为师，奉行“斯大林模式”，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建设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农业、轻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等为辅，这都很好地体现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中。宋庆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计划经济模式影响。

宋庆龄在有关经济现代化方面的论述中十分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她指出“人民共和国在建国的最初三年中，将全部时间用于重建国民经济”，在这个阶段之后，“即有计划地实现工业化阶段”^[6]。她认为要想实现工业化，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重工业，这是保障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手段，也是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文化水平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对中国来说，“其

重要性犹如心脏对人一样”^[7]。与此同时,她强调还要用很快的速度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通过国营农场以及农村合作互助社以现代化机械进行生产,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把广大、分散、原始的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上,恢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公路网,扩展公路、内河运输、空运以及电报、电话、无线电、邮政通讯网络,便捷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和资源合理配置。

总之,宋庆龄强调中国工业化道路要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以全面推动各项实业的发展,同时也强调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地位,这个构想与当时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指令规划可谓亦步亦趋,她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产物。

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科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宋庆龄从历史和现实分析,发现任何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国家,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她说:“我们正处在二十世纪的后期,也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我们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就一定要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断提高文化的素养。”^[8]如果“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就等于赤手空拳去打仗,那是要吃败仗的,是搞不成四个现代化的。”^[9]宋庆龄把掌握科

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看作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因素,认为它的掌握与否决定了现代化的成败。同时宋庆龄很强调人才培养,她认为政治、经济的现代化都是靠人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由人来推进的,因此人才的培养,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更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宋庆龄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和人才培养,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宋庆龄便前瞻性的提出了要大力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以及“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她指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10]。她提出用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青年儿童的脑袋,让青年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掌握科学技术。在宋庆龄看来,只有抓好了这件大事,才能“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腾飞于世界的理想”^[11]。宋庆龄不仅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培养人才的标准,那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宋庆龄认为促进人的现代化,提高人的素质是十分紧要的。个人素质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将提高,这“既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12]。为此,宋庆龄特别重视青年一代的素质提高,要求他们成为优良品格的人。创新也是人的现代化必备要素之一,宋庆龄认为在人才培养中,注重创新精神十分必要。她要求人们“不仅要学习新的技术,还必须创造新的技术”并深刻指出,创新这件工作是“我

们未来生命的血液”^[13]。她的这番言论充分说明了创新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有了优秀品质和创新精神还不够，夯实的实践能力对于人才来说也必不可少。她语重心长地要求青年们“志在四方”，敢于“远走高飞”，自觉地投身于改革、改造社会与自然之中，锻炼意志和能力，培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14]。概言之，人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为主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现代化。而宋庆龄关于大力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使传统的中国人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人，即实现人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15]。

结语

综上所述，宋庆龄对于建国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思考，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涉及层面之广，程度之深，在同时代的领导人中并不多见。她对于外交、政治、经济、科技、人的现代化建设层面的一些思想见解，与当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全文》来源出

国留学网，网址：<http://www.liuxue86.com/a/3351261.html>。

[2] 《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73页。

[3] 《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10页。

[4] 《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69页。

[5] 《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612页。

[6]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2页。

[7]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3页。

[8]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63页。

[9]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79页。

[10]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62页。

[11]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80页。

[12] 刘国友，傅绍昌：《宋庆龄现代化思想初探》，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13]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1页。

[14]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35页。

[15] 刘国友，傅绍昌：《宋庆龄现代化思想初探》，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浅谈博物馆讲解艺术的三重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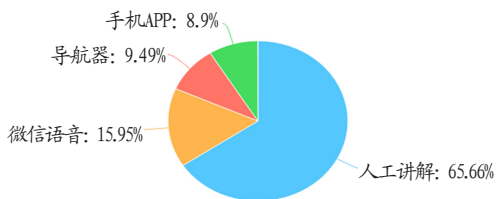
——“信”、“达”、“雅”

撰文 / 杭垚

博物馆讲解是以陈列展览和文物照片为依据，由讲解人员对讲解内容进行提炼，运用语言艺术、讲解技能和诚挚感情，直接有针对性地向观众进行传播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教育活动。提及博物馆讲解的历史，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906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开始设立讲解人员，称为“Docent（讲师）”。他们向观众耐心讲述馆内陈列品的名称、性质、时代等相关知识，这种方式很快受到时人的欢迎和认可，其他博物馆也纷纷仿效。在我国，最早提倡讲解服务的，正是南通博物院的创建者张謇。在他的眼中，讲解员和博物馆同等重要，应“遴选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从因受国内动荡而临时抽调的讲解员到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博物馆的第一支讲解队再到现如今的数万名专职讲解员，我国的博物馆讲解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在此背景下，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顺势而行，推出四种讲解方式，即人

工讲解（包括讲解员讲解和志愿者讲解）、微信语音导览、智能导览器及手机APP辅助参观。据《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2016年线上观众调查报告》显示，在所有受调查的观众中，喜欢人工讲解的观众比例是65.66%，喜欢使用微信语音导览的观众比例是15.95%，喜欢租借导览器使用的观众比例是9.49%，愿意下载手机APP进行导览的观众比例为8.9%。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人工讲解仍旧是观众的首选，因此，讲解服务质量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努力提升讲解技巧，丰富讲解内涵应始终被列为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中国的翻译界，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

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在笔者看来，博物馆讲解亦如此，作为文物的“译者”，要想准确、全面地传达文物内涵，并针对不同群体“因人施讲”，为之提供愉悦的参观体验，就要努力使讲解艺术达到“信”、“达”、“雅”三重境界。本文将以此三要素为维度，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例，着力探讨实践中讲解水平的提升。

信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博物馆是集体记忆的守护者，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和媒介，据美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在公众的心目中，87%的人认为博物馆真实可靠，与此同时，他们对书本的信赖仅有7%，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则更加被公众质疑。因此，作为全人类的宝库，博物馆储藏和阐释的记忆和文化必须真实、客观。

在严复的笔下，“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讲解之“信”亦然。博物馆讲解始终是围绕自身的藏品（即文物）展开，作为文物的“代言人”，博物馆讲解员有义务将藏品及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介绍给公众。文物藏品所包含的信息丰富多彩，因此，讲解必须涵盖文物藏品的基础性专

业知识：首先得掌握藏品的外观、材料；其次，需要了解文物的制造、使用、文字图像等，将文物置于原来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考察；再次，还原文物的发现及展出过程；最后，挖掘文物藏品表象特征背后的知识信息。

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文物馆第一单元陈列的“宋庆龄1907年赴美留学护照”为例，讲解首先要做的，就是传达这张护照的直观信息：护照中英文合璧，直长19寸，横长11寸半。前言为：“大清钦命监督江南海关道瑞澂发给护照事，兹有华人宋庆林确系中国，并非工作等辈，愿照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七月五号美国议院增修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五月六号《限制华工条例》第六款定章，请领护照前往美国。本道查得该领照之人确不在禁约之例。为此，印给华洋文合璧护照，请美国驻沪总领事官查验明确，盖印证实，准其前往美国境内居住。所有领照人姓名、年貌、身材、籍贯开注于后，请烦美国税关查照放行可也，须至护照者。”背面的英文内容中，姓名栏由宋庆龄按要求自己填写时用名“Soong Chung Ling宋庆林”，此外还填写宋庆龄痣认“右眉上有疤痕”、生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3年2月14日”，身高“5英尺”、原身份“学生”、入学时间“1902年”、入学地点“中西女塾”、最后居住地“上海”等内容。其次，应还原藏品的发现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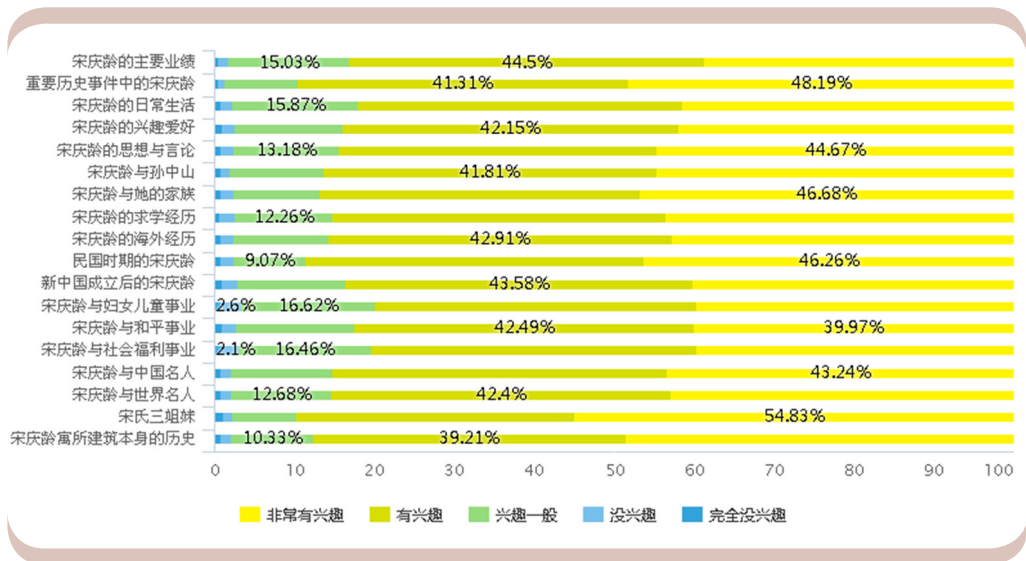
上世纪50年代末，著名学者周谷教授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任职，当时馆内留有很多清朝时期的档案文件，由于无人整理，这些清档便被视为废纸，任其投闲陋室。有一次周谷偶然心血来潮，打开其中一包注明为“待废”的档案，发现原来是一些中国海关道台发给出洋学生使用过的护照。当时周谷随手检出几张护照，其中就有宋庆林的。周谷当时不知宋庆林为何许人也，而且照片也缺损，不过他还是保存了这些护照，供日后研究之用。直到60年代，周谷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至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革命历史，至此始悟及护照上姓名为“宋庆林”的留美学生，即日后成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宋庆林”乃其青少年时期的原用名。1990年9月14日，周谷教授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捐给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

理委员会，今归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收藏。

达

“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要让读者通顺明白。任何一件展品都是静止的，被动的。讲解绝不是简单地依文物画瓢，而是要将文物展品表象所看不到的知识信息挖掘出来传递给大众，这就要求讲解员发现文物藏品与博物馆观众潜在需要和兴趣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依据进行施讲，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2016年线上观众调查报告》显示，参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观众对“宋氏三姐妹”非常感兴趣的占54.83%，居于首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是“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宋庆龄”和“宋庆龄与她的家族”。



这里仍以“宋庆龄1907年赴美留学护照”为例，如何将留学护照和“宋氏三姐妹”、“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宋庆龄”及“宋庆龄与她的家族”联系在一起，考验的就是一个“达”字：宋庆龄曾在各种场合谈到她的留美经历：“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熏陶，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不止宋庆龄，宋氏三姐妹都曾在美国留学，这与父亲宋耀如对子女的教育不无关系。宋耀如经常对他的孩子们说，要成为对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早在大女儿宋霭龄未满14周岁时，宋耀如就联系了美国大学的好友步惠廉，帮宋霭龄争取到了去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的机会。1907年，曾奉命出洋的两江总督端方下令在江南各学堂“祥慎挑选”两江范围内的苏、皖、赣三地男女学生，“由各该学司及教育总会咨送投考，分科考试，评定录取”，送往美国留学，主考官正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严复，最后遴选出10名男生和3名女生，宋庆龄名列其中，因此也可以说宋庆龄是近代中国首批官费留美的女学生之一。7月31日，宋庆龄等获江南海关道台瑞澂签发的留学美国护照，也就是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份。就在宋家紧锣密鼓地为宋庆龄赴美做准备时，年仅10岁的妹妹宋美龄也吵着同去。尽管父母觉得么女的请求可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她的苦苦哀求。大约在8月5日前后，她们与其他官费留

美的学生一起，乘坐“满洲里”号太平洋油船起航赴美。

雅

译事三难中，唯“雅”字难解，“雅”在讲解艺术中同样也是难以企及的境界。博物馆的讲解工作从来不只是简单地指讲解员的口头讲解，讲解艺术是集口头、表情和形体于一体，并在讲解员、观众、展品、陈列、环境等因素共同构成的活动。因此，一场好的讲解，需要讲解员知识广博、举止大方、温文尔雅、宾至如归，这样才能在有效实现博物馆的教育职能的同时，使参观者对讲解员产生由衷敬意，在心中留下畅达、优雅之感。知识广博在此不做赘述，想要达到举止大方、温文尔雅的境界，还得从语言艺术、体态规范、服务态度三方面谈起：

讲解首先是一种口头表达，因此，口齿清楚、说话流利、普通话标准是讲解艺术的基础要求。讲解的受众是游客，想要让游客听得舒服，就要使讲解的音量尽可能平稳，声调也要优美。讲解是知识和语言的有机结合，语言运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观众，因此，要在讲解中用精炼的语言传递最多的信息，情绪随着讲解内容的起伏而起伏，充满感染力，这样才不会让游客产生听觉疲劳，反而在聆听的过程中感觉饶有趣味。

讲解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因此，

讲解员的体态对于讲解艺术的提升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作为博物馆形象的直观展示，讲解员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和体态规范。站立讲解需要保持身体与地面垂直，抬头、挺胸、收腹，两肩放松，双臂自然下垂或体前交叉，切忌站姿松垮、弯腰驼背；行走讲解时，需要事先规划好参观路线，侧身面对观众行走。行走时，要精神饱满、步伐轻盈，动作协调一致。自然大方、干净利落的体态可以让讲解效果倍增。

讲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服务，在每一次的讲解中，讲解员都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施教者的素养，真诚地做好每一次游客接待服务。因此，讲解员应坚持以“为游客服务”为宗旨，设身处地为每一位游客着想，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来自博物馆的温暖和亲切，从而让游客在讲解员的讲解中得到如沐春风的愉悦体验。

讲解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是联系博物馆和观众的桥梁，关乎博物馆的公众形象。一场好的讲解，是在讲解结束后，讲解员酣畅淋漓和观众意犹未尽的结合，为此，我

们应努力达到“信”、“达”、“雅”的三重境界——讲解之“信”不难实现，牢记讲解词，熟悉每件文物的基本概念和要素即可；讲解之“达”着实需要狠下一番功夫：一是要做好研究和积累，清楚文物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二是要做好观众调查，结合观众的参观兴趣做有针对性的展开；最后，只有亲切热情、举止大方，给观众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并在讲解的过程中娓娓道来，才能让观众对渊博精彩的讲解内容和温文尔雅的讲解形象回味无穷。



[1] 单霁翔：《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质量的思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

[2] 朱玖琳：《宋庆龄与近代中国首批官费留美女生》，《世纪》，2012年第6期。

[3] 唐琳：《现代博物馆讲解艺术》，中西书局，2014年9月第1版。

[4]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故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科学管理 主动出击

——2017年普通高中社会实践工作札记

撰文 / 高海涛

2015年，为配合市教委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作为上海市首批中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我馆对品牌实践项目——“宋庆龄班”志愿服务活动进行升级调整，面向全市高中生推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志愿服务项目”。两年来，我馆始终秉持让同学们“来有所学，学有所用”的宗旨，对服务岗位持续进行了梳理和优化，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规范，完善了服务手册和 workflows，总结出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操作方法。我馆不仅作为全市唯一的场馆代表在《关于加强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志愿服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媒体通气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和有效做法，翁铁慧副市长更是亲自带队来到我馆调研高中生社会实践工作。如今，我馆的高中生社会实践工作日臻成熟，笔者拟围绕今年高中生社会实践工作的方方面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更科学的管理机制

2015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推出后，只是提出

今后的高中生社会实践将客观记入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并没有任何平台和我馆高中生服务信息做对接。当时高中生如果需要服务证明，流程也很繁琐：首先要向我馆申请——宣教部查询服务记录——核实无误后打印服务证明——单位盖章确认有效——发放给申请人。此外，服务记录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历史记录查询不便。今年，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各学校和各高中生社会实践基地都可以通过博雅网（<http://www.21boya.cn>）对接。

通过该网络平台的系统，我们在博雅网上完成岗位的发布、学生签到和反馈，比以往更透明、更快速、更便捷。这个系统把高中生社会实践的步骤实现了电子化，报名参加实践的学生姓名会由校方提交给博雅网平台，我馆根据实际到岗人数对学生签到，并对学生的服务表现给予评价。在学生服务结束后，学生们可以自行登录博雅网查询到自己的服务记录。这大大简化了以前的流程，是管理机制上的突破。



▲ 博雅网高中生社会实践信息记录电子平台

二、更完善的反馈机制

目前，我馆的高中生社会实践服务项目的受众仍以“宋庆龄班”的同学们为主，为了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全面提升高中生的综合素质，也提升我馆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职能：每年在这项工作开始前，我们会根据岗位情况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让学校帮助落实，做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沟通。比如讲解接待岗，学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了解岗位职责，熟悉背诵讲解词的。如果不提前将讲解词发给学生，他们来了之后就无法履行岗位职责。现在有了与学校的互动，这些工作提前就能落实好；服务过程中，我们也会督促和指导进馆服务的同学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提高服务的主动性，并就服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学校沟通，共同应对；在服务完毕后，我们对该校学生的具体表现与负责老师一一反馈，并挑选部分学校进行走访，总结当年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也一同制定来年高中生社会实践服务的方案。



▲ 我馆工作人员对学校进行回访

三、根据实际情况改进工作方法

1. 突破空间限制

我馆是一个占地4800平方米的人物类纪念馆，受一定客观条件的约束，可开放的服务岗位自然也有限，尽管我们已通过分解工作职责、开发多元岗位的方式给同学们创造更多的实践服务机会，但每年最多只能接收500名同学来馆服务。目前，与我们共建的高中“宋庆龄班”就有十几家，还有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等学校派学生来我馆实习，所以需求和供给上已经有了矛盾。未来，我们应该开拓思路，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开发“线上志愿服务”，让同学们“足不出校”就能完成实践学分——如新媒体宣传稿的撰写、主题活动方案的策划等等。



▲ 高中生在我馆进行社会实践，为游客讲解

2. 完善培训管理机制

要想做好高中生社会实践工作，就必须充分考虑高中生的特点，因材施

教。高中生的可塑性强，背诵讲解词对他们而言相对较容易；他们的好奇心很强，工作上手快，但是耐力不够，机械性的工作会让他们很快厌倦。根据他们的特点，我们在培训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召集所有学生进行全岗位的培训，让他们对各个岗位都有所了解，给他们岗位互换的可能性；在培训上岗后，需要每天不定时去各个岗位巡查，看到不符合工作规范的问题要即时指出，敦促其立即改正。良好的岗前培训和岗位巡查并重是确保学生规范服务的有利保障，这也是我们多年工作总结的经验。

3. 加强馆校合作

在高中生社会实践工作中，我们不能被动等待，而是要主动出击。作为非正规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我馆应充分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馆校合作中的行为、动机，主动“走出去”，倾听学校、学生的意见和需求，共同探索馆内蕴含的巨大教育价值。同时，我馆应依托学校，加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结合学校的教学需要，共同开发更多的社会实践岗位，促进更多教育产品的开发，实现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上的共赢。

知音雅汇

——宋庆龄、周小燕、蒋英珍藏唱片展参展记

撰文 / 麦灵芝

今年6月，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联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共同举办了“知音雅汇——宋庆龄、周小燕、蒋英珍藏唱片展暨唱片文化与上海系列讲坛”，以唱片为载体，讲述关于老唱片以及老唱片与三位杰出女性的故事。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周小燕是造诣很深的著名声乐家，蒋英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的夫人，也是声乐领域的教育家。三位女性，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社会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深受人们的敬仰与爱戴。她们从小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在音乐、艺术方面也都有着各自的爱好、品味和典藏。展览由三个馆分头撰写各自的展览大纲，挑选展品。徐汇区文化局负责展览的各项筹备及设计布展工作。

唱片展按人物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之瑰宝：宋庆龄”，展示了宋庆龄收藏的各种唱片，唱片目录、乐

谱等并附以她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我馆挑选的宋庆龄收藏的唱片有：美国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出品的《白色圣诞节、柏林华尔兹旋律》、《维克多·赫伯特作品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百代公司出品的30年代电影插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广东音乐《秋水龙吟、并蒂莲》等宋庆龄生前爱听的音乐，还有孙中山演讲唱片《救国方针》，在美国录制的《起来——新中国之歌》，中国唱片公司出品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歌唱祖国》、《伟大祖国百花吐艳》、《达维德·奥伊斯特拉赫访华演出节目选辑》等。为了使观众有更好的体验，我馆还提供了唱片的录音和宋庆龄的演讲视频，在展厅里播放。这次展出的唱片都是根据宋庆龄不同时期的收藏来挑选的，一方面反映宋庆龄的音乐爱好、修养和鉴赏品味，另一方面揭示宋庆龄和孙中山革命活动中与唱片有关的一些历史痕迹。

上海是中国唱片生产最早的发祥地和主要的生产基地。孙中山、宋庆龄与

唱片也有过各自不同的联系。早在1917年，孙中山就邀请日本人镗尾庆三来沪创建中国唱盘留声公司，经过一番买地建厂、设备购置的筹备工作，唱片公司最终在1920年前后投产，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唱片品牌定名为“大中华”。该公司建成时是由中日合资经营，1927年中方收回日资股份，改由中国人自己经营，并更名为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所以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唱片公司是在孙中山先生倡导下建成的。这次我馆专门选送了宋庆龄珍藏的孙中山演讲录音唱片展出，既是为了反映宋庆龄与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奋斗的伟大精神，也是对孙中山为中国唱片工业曾经做出的贡献表达敬意。该唱片是根据1924年5月30日，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社之请，发表的演讲录音制成，共3张，第1张《勉励国民》和第2张《告诫同志》都是用国语演讲的录音，第3张《救国方计》是孙中山用粤语演讲的录音。这3张唱片是孙中山一生唯一录制的演讲录音，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同样，唱片对宋庆龄而言，也不仅仅是她的一项音乐爱好，有时还和她的革命活动有关。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曾亲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并倡议筹备国民伤兵医院。医院建成后，她经常去慰问伤兵。十九路军官兵多为广东人，为慰藉他们的思乡之情，宋庆龄特地选购了一些广东音乐的唱片送过去，放给伤兵们听。所以，

这次我馆特地展出了宋庆龄当年收藏的广东音乐，以纪念当年她的义举。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套由宋庆龄题写序言的唱片集《起来——新中国之歌》也非常有意义。这张在美国录制的唱片中，有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中国歌曲。保罗·罗伯逊是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名誉会员，当年他曾积极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义演，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1940年，也是“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的音乐家刘良模赴美国宣传中国抗战，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教他唱中国歌曲。后来他们在纽约录制了这套唱片。宋庆龄专门为这套唱片作了序，序中写道：“中国从这次新的大众歌唱运动中找到了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我们这些古老的民谣和融合了东西方音乐形式的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连接自由人民的纽带”。据说，这套唱片发行的收益捐赠给了“保卫中国同盟”，用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所以这张唱片不仅是美的声音记录，更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象征。

除了这些与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活动有关的唱片之外，在这次展览中，我馆还从唱片本身的角度，展出了一些独具时代特征、且发行量较少、比较珍贵的唱片。比如：宋庆龄收藏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歌唱祖国》是张红唱片，这张唱片的片基呈暗红色，牌号为“红唱片”，由于这种红唱片生产时间不足

一年，产量很有限，目前存世比较少，较为珍贵。另外一张是专为1957年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录制的唱片《达维德·奥伊斯特拉赫访华演出节目选辑》，这套唱片共8张，当年是以“资料唱片”的名义内部发行的，存世也不多，这次展出的是宋庆龄收藏的其中一张。

展览的第二部分是“中国之莺：周小燕”，这部分除了周小燕的生平照片，主要展出了周小燕演唱的录音唱片《小杜鹃》、《千里草原把身翻》，以及她收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和《音乐剧集锦》等唱片集。

第三部分“师者典范：蒋英”，陈列了钱学森喜欢的贝多芬的唱片、蒋英收藏的苏联、中国民歌，舒伯特、莫扎特等音乐唱片以及蒋英的生平照片。

展览于6月10日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徐汇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陈石燕、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金晓春、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执行馆长张凯分别讲话，并为展览揭幕。

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了“唱片文化与上海”的系列讲坛。沪上专家、学者、老唱片收藏爱好者，共同探讨了老唱片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传承和发扬老唱片承载的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葛涛研究员，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中心，介绍了徐家汇与近代中国唱片业的因缘。上海大学文学院钱乃荣教授则论

述了老唱片对上海沪剧的繁荣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原副总编辑陈建平则是从中国唱片业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论述了中国唱片的百年历史，是上海应该留住的城市记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赵炳翔以中国唱片上海分公司为例，着重介绍了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的保护、采录与整理的情况。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副秘书长韩斌则对中国唱片工业中的一段奇缘，艺声唱片作了详细的介绍。唱片收藏研究者冯珩，邬光业讲述了他们在唱片收藏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事。

唱片作为一种声音的记录，不仅记录了听觉艺术的美也是记载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它所具有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唱片业起源于上海，发展壮大于上海，上海是中国唱片业最重要的基地。2017年是上海百代公司、大中华唱片厂建成投产100周年，唱片业的百年历史，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事业息息相关。在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选择以老唱片为题，举办这样一个唱片收藏展，讲述名人与唱片的故事，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也是我馆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和形式，增强展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来宣传宋庆龄、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尝试。三馆联合办展也为我馆今后的办展模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风雨同舟五十载” 文物史料展

——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宋庆龄的革命情谊

撰文 / 王建明

2017年12月2日是宋庆龄的新西兰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120周年诞辰。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信中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之间的友情始于1930年代的上海，自此延续了将近五十载的岁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收留保护地下共产党员，从事革命活动以唤醒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开展生产自救、募集物资以支援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共同倡导世界和平，致力于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宋庆龄评价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值此路易·艾黎诞辰120周年之际，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特举办专题展览，以寄深切的缅怀和纪念。展览共展

出文物和相关史料共一百余件，不仅有艾黎1958年送给宋庆龄的青花瓷器、宋庆龄保存的艾黎照片、私人通信、签赠著作等馆藏藏品，还有近期从海内外机构和私人征集来的珍贵照片和文稿函件，大多系首次公开展示。



▲ 展览入口处

展览通过早年艾黎、上海岁月、携手救亡、同播友声、暮年深情等部分详述了艾黎与宋庆龄风雨同舟五十载的往事与情谊。

早年艾黎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一户爱尔兰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学校校长，十分关注社会问题。



▲ 展厅内景

她的母亲是一名家庭女教师，是新西兰女权运动的先驱。据艾黎自己的叙述，他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路易的名字取自一位奋力抵抗英军的毛利族首领——路易·曼尼亚波托，或许这也就注定了路易·艾黎与革命结缘的一生。路易·艾黎读小学时就是校卫队的成员，并且经常列队操练。1916年，艾黎志愿加入新西兰远征军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功荣获勋章。战争结束后，路易·艾黎回国和老同学共同集资拓荒垦殖，经营农场。在农场里，他笑言像奴隶般劳动，有时一天要干16个小时。正值农业经济衰退期，路易·艾黎和老同学经营了6年的农场所得甚微。1925年，他偶然读到《奥克兰新闻周刊》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引发他对中国大革命的关注，决意在次年前往中国闯荡。

上海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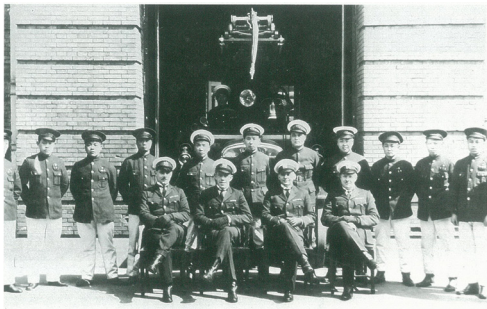
192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乘船抵达上海。抵沪当日，他便给父亲去了一封家书，谈及在中国谋生的困难。但

很快，他就在朋友的举荐下入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火政处所属的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当起了一名消防员。彼时，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艾黎抵沪前不久，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夏，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多次发表通电和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也就在这时，艾黎通过报纸读到有关宋庆龄的报道。后来，他又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文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中进一步了解了到宋庆龄在武汉和莫斯科的情况。1933年春，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引荐下，路易·艾黎在宋庆龄莫里爱路寓所（今孙中山故居）与其相识，自此结下半个世纪的友谊。

在上海，艾黎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德共党员汉斯·希伯、英共党员甘普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耿丽淑和陆慕德、美国医生马海德、奥地利进步青年魏璐诗、麦伦中学教师曹亮等人。他们不定期聚会，讨论政治，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得到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宋庆龄还帮助他们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间接从事革命活动。

1934至1937年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流动地下电台，便设在艾黎愚园路的家中，用以与长征中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同时，他的家也掩护了许多重要的中共地下党员，如西安事变前后出任

中共驻张学良东北军代表的刘鼎、从事情报工作的陈翰笙、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饶漱石等人。



▲ 1929年艾黎（前排右二）任工部局火政处督察时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同时，艾黎与宋庆龄等人还秘密采购医药品和枪械，设法运送到苏区。艾黎利用他工部局督察的身份，驾驶公务车和自备车将物资在市区之间转运，巧妙地避开租界巡捕的检查卡哨。不仅如此，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路易·艾黎和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夫妇于1936年一同创办了《中国呼声》杂志，用他犀利的文笔以多个化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此期间，艾黎还创作了小说《囚徒》和舞台剧本《黎明之前》，反映了当时上海工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华界的大部分地区化为废墟。起初宋庆龄坚持留在上海，后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撤离。在1937年12月23日的清晨，宋庆龄巧借艾黎的高级督察身份，在他的护送下顺利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乘船赴香港。

携手救亡

战火仍在全上海蔓延，日军对工业区的恣意破坏让艾黎沮丧，杨树浦、闸北和虹口残破的景象更令他感到战争对老百姓的伤害之大。坐以待毙绝不是办法，艾黎与斯诺夫妇经常在一起探讨进行探讨，他们有了在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很快，艾黎将想办法落实成小册子，这些想法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年6月，艾黎只身乘船赴香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取得了宋子文承诺的资金支持，乘机飞赴汉口与行政院接洽，争取政府的认可与支持。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在武汉正式成立，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任工合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聘任艾黎为工合技术顾问。随后，艾黎在陕西宝鸡成立第一个地区办事处。在艾黎的领导下，人们齐心协力，只用了两个星期便成立了十多个合作社，3个月内就生产出许多供应军需民用的物品，工合协作社的规模不断扩大。



▲ 1940年4月25日，宋氏三姐妹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图为宋蔼龄和宋庆龄在巡视。

工合的事业也得到了宋庆龄的鼎力支持，宋庆龄亲自担任工合香港促进社的名誉主席。1939年夏，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1939年底，宋庆龄在香港ZBW电台发表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她强调，“工合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1940年4月25日，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三姐妹一同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宋庆龄在工人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对工合给予大力支持，保盟的年度账册中清楚地记录着收支流向，而这其中的许多钱款都用于援助工合。1941年下半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接连发起了“一碗饭运动”与“嘉年华会——工合展览会”活动，为支援内地的工合运动筹集善款。

早在工合刚兴办的時候，艾黎就意

识到，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对工人进行管理和技术培训，故1941年起，艾黎就在工合西北区的宝鸡、成都等地试办培黎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学生就读。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抗战局势的变化，后来又集中西迁至甘肃兰州和山丹县，继续扩大办学规模。1942年底，艾黎因为长期支援解放区的工合事业，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业合作协会以“通共”为由解雇。后来，艾黎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秘书的身份继续开展他的工作，将全部精力用于创办培黎技术学校。

宋庆龄始终关心着艾黎的教育事业。1945年5月，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夫妇函中提到：“我们（指她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将举行两场舞会，希望能筹集到两百万元，用于培黎学校和由贺耀祖夫人主管的难童收容所。1948年，宋庆龄曾派中国福利基金会（其前身为“保盟”）的工作人员去甘肃山丹县视察该会重点援助的培黎学校，还托人给艾黎带去一瓶白兰地酒和一封亲笔信致以问候。



▲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期间，宋庆龄（前排居中）与艾黎（后排右五）等各国参会代表的合影

同播友声

解放前后的几年中，艾黎大部分时间在甘肃山丹主持培黎学校，很少有机会同宋庆龄会面。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0月宋庆龄等人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致开幕词——《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她说：“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要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的。”而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在发言中提到，“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增进中外友好交流。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通过发表演讲、起草会议决议、写诗著文，为宣传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做了许多工作。在那些年里，艾黎陆续走访中国多地，写了许多纪实报道和诗歌，不少都发表在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上。1953年起，艾黎正式定居北京从事写作，先后出版了三十余部如纪实采访、诗歌和翻译等著作。1963年，宋庆龄在读过艾黎翻译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英文版后十分欣赏，特意推荐给身边的英文秘书。到1970年代，她又要工作人员觅购该书几本送到寓所，分赠国外朋友。上海宋庆龄故居至今保存着宋庆龄收藏的

20余本艾黎著作，其中不少有艾黎德的题赠签名及手写便条，也见证着两人数十年的友情。

暮年深情

宋庆龄与艾黎之间的友谊在他们的晚年更趋深厚。“文革”中，许多在华的外国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人身限制，艾黎也未能幸免。为保护艾黎，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亲笔为他写了封证明信，她写道：“我觉得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亲笔证明信也使艾黎免遭怀疑和迫害。事后，宋庆龄对送证明信的秘书张珏说：“现在，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我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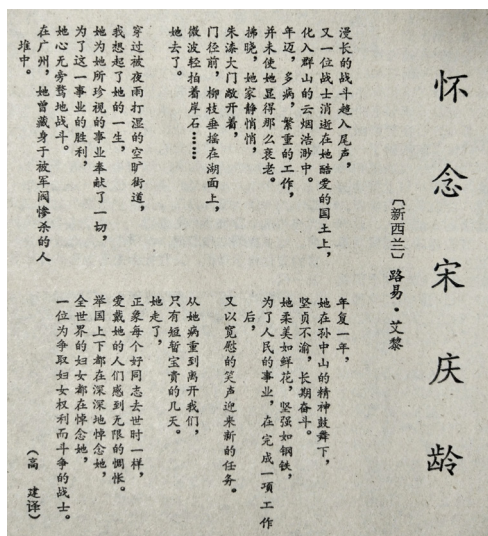
▲ 1980年12月宋庆龄为艾黎庆祝80岁生日留影

为艾黎庆祝生日是宋庆龄晚年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有时甚至提前数月就开始准备。如今，我们还能看到许多宋庆龄在北京寓所邀集老朋友给艾黎共同庆祝生日的留影。在一张1980年12月2日的照片上，艾黎正在切蛋糕，宋庆龄高兴地在旁拍手称庆，气氛十分温馨。然

而，此后的宋庆龄再也没能为艾黎继续举办生日宴。1981年，她不幸患上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尽管医生一直精心地为她治疗，但病情在发展。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抢救神志恢复清醒。在深夜得到紧急通知的艾黎立即前往探视，在宋庆龄的病床前说了声“路易在这里”，双眼已经看不见的任何东西的宋庆龄似乎还能听见，隐约点了点头，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叙。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当晚，艾黎前往宋庆龄寓所瞻仰遗容，并参加治丧委员会为她守灵。在宋庆龄逝世的日子，艾黎两天内写出了五首悼诗和两篇回忆文章，以寄托他的哀思。在艾黎后来撰写的《自传》中，他还专门写了一节题为“巨星陨落”的悼念文章。

1981年6月4日，宋庆龄骨灰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举行。艾黎出席安葬典礼，并将一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前。

斯人已去，空余思念。艾黎在回顾他与宋庆龄半个世纪交往的往事时感慨道：“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1986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五周年时，艾黎抱病来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宋庆龄陵园举行的纪念碑落成典礼，他发言讲到：“我很感激受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的一生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



▲ 艾黎著《怀念宋庆龄》诗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90年的传奇人生，而这其中有60年都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什么促使一个新西兰人来到中国，并在此度过他的一生？艾黎曾自言“伟大的革命带来了好处，它激荡着那个时代的一切，正像它如今仍然激荡着我们；同我一道走过来的人们，至今把我当作同行者的人们……多种因素把我同中国联系在一起……我始终感到欣慰，由于曾经在这条或那条道路分担它伟人的抱负。”宋庆龄正是使他踏上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并不断给予他激励和力量。

宋庆龄和艾黎已逝世30余年，而他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之间半个世纪的深厚革命情谊定将永留人间。

托彭舞面具考

撰文 / 宫洁菁



▲ 印度尼西亚面具



▲ 印度尼西亚面具

上海宋庆龄故居主楼餐厅东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两个面具，左右侧各一个。这两个面具是人脸样式，一红一白，颇具异域风情，还带着些许宗教色彩。宋庆龄将它们摆放在这里并不是随意而为，是有着一定意义的。

这两个面具出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是爪哇著名的哇扬托彭（wayang topeng）舞面具。“哇扬托彭”是印尼语，“哇扬”是爪哇的一种古典木偶戏，“托彭”字面解释是“按在脸上”，可引申为“面具”的意思。所

以，通常哇扬托彭舞就是面具舞的意思，可简称之为托彭舞，或托宾舞、面具舞。

印度尼西亚人民酷爱舞蹈，他们的舞蹈种类极多，如凯卡克猴舞（Kecak）、巴龙舞（Barong）、黎弓舞（Legong）、桑扬舞（Sanghyang）、库帕克舞（Cupak）等等，每一种舞蹈都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托彭舞是其中的一种，源自爪哇。托彭舞传统被认为是16世纪引进爪哇的，有传说是早期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大圣人”

(Wali Sanga)^[1]所引进的。因此,托彭舞本身虽没有宗教上的意义,但保留了宗教的特性,即神圣性。当地的人们相信,舞者能够通过面具与祖先和神的灵魂作交流。

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表演艺术之一,托彭舞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从一开始单纯的舞蹈,逐渐精炼成一种配有音乐和故事的艺术形式。最初的托彭舞多被用于各种仪式,如社团庆祝活动、病后痊愈庆典、葬礼等,宗教色彩比较浓厚;后来,托彭舞慢慢变成了一种地方舞蹈形式。直到今天,印尼的巴厘岛等很多地区都还能观赏到托彭舞表演。

作为一种面具舞,托彭舞属于“面具文化”。事实上不止印度尼西亚,全世界各国、各地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面具文化”。这是一种由原始图腾演变发展而来的文化,积淀了历史、宗教、艺术以及民俗等多种内涵,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特殊的外在形式。面具是造型艺术的一个特殊领域,它虽历经发展变化,仍可从窥视到各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和精神风貌,是很有研究意义的。

托彭舞所使用的面具基本都是木质的,在木头上雕刻出不同的人脸、花纹,然后着色。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譬如,独特的脸部,典雅的五官,精巧的胡须,别致的发型,丰富的装饰,精美的蔓藤花纹等,都是爪哇艺术

的主要图案。托彭舞传统中有许许多多的角色,每个面具都代表不同的角色。舞者要做的就是用面具所代表的角色的身份来跳舞,这需要很高的技能,因为舞者无法通过面部表情传达思想和意图,只能透过肢体动作展现角色的特性。当舞者戴上面具后,便成为面具所描绘的神或人物,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舞蹈表演。

宋庆龄在餐厅里摆放的两个面具是托彭舞中的两个重要角色。白色面具代表班基王子(Prince Panji),红色面具代表克拉纳国王(King Klana)。班基王子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是剧目中的主角人物;而克拉纳国王则被认为是一个外族的国王,12世纪曾对东爪哇的谏义里(Kediri)的首都发起过威胁。两个面具的颜色、五官、发饰皆不相同,细细端详,似乎能够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场扑面而来,“班基王子”的和善沉稳与“克拉纳国王”的凶神恶煞相映成趣,非常生动。

值得一提的是,班基王子的故事虽诞生于爪哇,但决不仅仅应用在托彭舞中,它是继印度两大史诗^[2]之后在东南亚范围内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在印尼文学史和东南亚文学史上均占有特殊地位。班基的故事版本诸多,既有正式文本《班基·固达·斯米朗传》,又有口传文本,还有皮影戏、木偶戏和面具舞等表演传统,都不尽相同。但大致都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

故事，以及在寻求爱情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保家卫国的英雄事件。

回到宋庆龄餐厅里的两个面具，那么这对产自印度尼西亚的托彭舞面具又怎么会出现在宋庆龄上海的家中呢？

追溯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印度尼西亚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于1950年4月13日正式建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与印度尼西亚的渊源也由此开始。50年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处在“蜜月期”，双方交流互动频繁。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曾数次与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会面，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苏加诺十分亲切地称呼宋庆龄为“最最亲爱的姐姐”^[3]。宋庆龄一生中曾有一次踏上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即1956年的那次出访。

1956年8月14日，宋庆龄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该国政府的邀请，率团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为期十天的友好访问。^[4]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踏足雅加达、万隆、日惹，以及巴厘岛等城市和观光胜地，对印尼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在三地停留期间，宋庆龄一行人多次接触到了爪哇的民间舞蹈，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以下为官方报纸以及随行人员的记录：

8月18日上午，宋庆龄率团抵达万隆，下午冒着细雨游览市区，瞻仰曾经作为亚非会议会场的独立大厦。晚上出

席西瓜哇省省长萨努西·哈贾韦纳塔举行的晚宴。宴会结束后，观看晚会表演，有三个西瓜哇民间舞蹈节目，还有华侨学生的竹管乐和伞舞。

8月19日上午，宋庆龄率团由万隆飞抵日惹，在国家大厦后厅参观了工艺品展览。这个展览是专为宋庆龄的访问而布置的，日惹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和成品都有集中展示，有银器、木器、花裙、皮制品，等等。

8月21日上午，在沙里民省长和夫人的陪同下，欣赏了巴厘的美丽风景，并在几个地方分别参观了银器店，木刻制品和巴厘绘画展览。晚上，观看了巴厘的民间艺术表演。

笔者推测，在这几天时间里，宋庆龄接触到了托彭舞和托彭舞面具，或许是在观看舞蹈节目和民间艺术表演的时候，又或许是在参观工艺品展览的时候。究竟是宋庆龄亲自采购了两个面具还是印尼方面赠送给了她，又或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朱霖的准备^[5]，尚未查到确切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宋庆龄对托彭舞面具很有兴趣，对这一红一白的两个面具更是十分喜爱。因此，回到上海家中后，她就这两个面具悬挂在了餐厅最高处，让每一位到她家中做客的宾客都可以一眼就看到它们。

事实上在宋庆龄的寓所里，印度尼西亚元素并不鲜见。过道厅里的两幅画，二楼宋庆龄卧室门口的油画，客厅



▲ 宋庆龄在日惹国家大厦后厅参观工艺品展览

沙发前的小雕花方桌，餐厅一角的格里斯剑等，都来自印尼。当然这与宋庆龄曾经出访过印尼不无关系，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宋庆龄是喜爱这一类东南亚风格的艺术品的，因此特意把它们布置在寓所的显眼位置。这样的布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宋庆龄对中印两国友谊的赞赏和珍视。



[1] 九大圣人：Sunan Ampel、Sunan Bonang、Sunan Kalijaga、Sunan

Gunungjati、Sunan Giri等，他们早期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在爪哇当地相当受到尊敬，被认为具有超自然力量。

[2]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

[3]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09页--4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宋庆龄年谱（下）》第144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0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一张老照片 记中西女塾校舍之变迁

撰文 / 费佳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的文物馆中陈列着一张宋庆龄珍藏的母校中西女塾校舍照片，照片正中是一栋西式风格的三层楼建筑，四周空旷。不少游客在参观时都对这幢建筑充满兴趣，“这幢房子在哪里？”“房子今天还在吗？”“中西女塾是什么学校？”



▲ 宋庆龄珍藏的母校中西女塾校舍照片

中西女塾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女子学校，1892年建校于汉口路西藏南路口（今沐恩堂所在地），1917年迁校至忆定盘路11号（今江苏路155号，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所在地），1930年正式向国民政府立案，改校名“中西女子中学校”，1952年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成立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这里培育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新时代女性，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宋氏三姐妹。1902年—1907年，宋庆龄曾在这里接受教育。

然而，无论是对照学校建校之初的沐恩堂，还是如今市三女中校园，都无法找到与照片中相同或类似的建筑。那么，这幢建筑到底位于何处？它与中西女塾有何联系？

创校之初

1885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共同筹划在上海创办一所新式女子学校。和当时其他一些招收贫苦家庭孩子的教会学校不同，从筹备之初，这所学校就将目标定位于中国上层家庭的女子教育。对于校址的选择，林乐知在四处寻找下，最终选择了位于汉口路西藏路转角的一块9亩地。用于购买土地及建造校舍的两万五千美元的资金主要由海淑德以募股方式筹集，并得到了当时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墨梯主教（Bishop McTyeire）的大力支持，他号召教徒们

慷慨解囊。然而正当这所学校在建造的过程中，墨梯主教不幸去世。为了纪念他，学校英文校名取McTyeire School。

1890年学校正式兴工起建，经过两年的努力，1892年3月15日，中西女塾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典礼当天仪式隆重，出席人员包括了众多上海地方官员及美国驻沪副总领事。尽管当时中西女塾并未在中国政府办理过任何立案手续，但典礼当天上海道台聂仲芳的出席，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学校的支持。仪式结束后，校方还邀请来宾参观校舍。一楼是教室和食堂，教室中课桌椅都是按美国学校的式样定制，石质的黑板镶嵌在墙壁中部恰当位置，教具、教学用品一应俱全。宿舍在二楼，窗和寝室用具皆按中国习惯布置，配有盥洗室和浴室。校舍西翼是教师住宿和生活区域，设有“教师之家”的餐厅。来宾们还被招待在这里喝下午茶，大家对学校的设施表示满意。

“经家花园”

1900年前后，中西女塾在社会上的声望日高，源源不断地有中国家长愿意付费让自己的女儿进来读书，这其中不仅有上海本地的家庭，还有不少外省市的人们也慕名而来。学生注册人数从1892年的7人，增至百余人。尽管校舍一再扩充，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校舍问题成了时任校长海伦·莲吉生所面临最严峻问题。考虑到学校未来发展的需要，莲吉生开始寻找更合适的新

校址。

1916年莲吉生得到消息，沪西地区有一处名为“经家花园”的花园别墅以8万元出售，别墅的主体是一幢豪华大洋房，旁边有一些小建筑，楼前配有很大的草坪、荷花池，池中央是喷泉。周围很空旷，虽然房屋不多，但总占地面积很大（约89亩），很适合做一所学校。于是她当机立断，在没有征得教会总部同意的情况下，以贷款方式买下了这处地产。事后她才向美国教会总部说明情况，将原来汉口路的校舍卖给教会，用所得款额的2/3偿还了贷款。当时上海的英文报《字林西报》上记载了这一不寻常之举。



▲ 1917年被命名为莲吉生堂的教学楼

1917年初，学校正式迁入这处位于沪西忆定盘路11号的“经家花园”。在学校校刊《墨梯》的创刊号上曾登载《新校舍记》一文，详细描述了学校的建筑及其内部分布功能：新校址主楼为中西女塾师生教学和生活场所。这幢中西风格结合的楼房共有四层，在建筑顶部有一大阳台，被称为屋顶花园。楼梯是螺旋形的，扶手是一条盘转着向上的雕龙，楼房顶部是一平台，巍然高耸在四围都是低矮建筑的旷野

中。登上楼顶向四面举目张望，景观尽收眼底。向西是“白郭青堤，竹篱茅舍”，一片村景。南面有高大的楼房和绿树草坪，各色鲜花盛开，那里有较多洋人侨居。西南面隐约可见徐家汇李公祠交通部实习学校的屋顶。东北一角，工厂林立，人烟稠密，传出汽笛声声。正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里，学校得以继续成长，这座校园也成为莲吉生校长留给学校的最后一份礼物。1917年7月，莲吉生因病与世长辞。为了纪念她对学校所做的贡献，学校师生们决定将校区中的主要教学楼命名为“莲吉生堂”。这座“莲吉生堂”正是宋庆龄珍藏的照片中的那幢校舍。

新“莲吉生堂”

搬迁到忆定盘路校址，标志着中西女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与壮大。

随着学校生源的不断增长，一幢“莲吉生堂”已无法满足学校的需求，这幢房子既作教学楼，又是宿舍，里面还包括了图书馆，学生们几乎一切活动都在这幢楼内进行。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在楼里“住校生挤得像沙丁鱼一般，教师们只能见缝插针，哪里有地方就住哪里……”

于是，学校又先后在校园里建起了三幢建筑：1920年学校用自己的资金建起了一栋教师宿舍楼，并将其中部分房间用作教室。1922年，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一做美国学院派哥特风

格的学生宿舍楼“兰柏一克洛普顿堂”落成。当时的《上海星期时报》对此做了报道：“中西女中划时代的新建筑……兰柏堂……林乐知博士梦想的实现，上海的出色成就。”1929年，通过中外人士的捐款以及学生义演募捐，学校建起了体育馆。这几栋楼直到1980年代还在使用。

原来的“莲吉生堂”一直使用到1933年，因年久失修，不堪重负，学校决定将老楼拆除，并请邬达克在原址上设计建造新教学楼。经过两年的建设，新莲吉生堂焕然升起。建筑采用花岗石和钢筋混凝土，外墙立面简洁，矩形钢窗，正门有一大两小三扇向外开启，正中门框高达两层并带有哥特式的尖顶，门和门框之间有一层楼高的三扇常见于欧洲中世纪教堂那样的哥特式彩色玻璃窗，楼内地面全部为浅色水磨石。从正门进入大楼，有高大宽敞的圆弧型前庭，前庭中央地面上刻有中西女中校训图案。新莲吉生堂建筑面积4600多平方米，是市级优秀保护建筑，也是学校主要的教学楼，解决了学校全部的用房问题。那里有教室、图书馆、活动室、自习室、教员办公室和一个大礼堂。1935年的校刊《墨梯》上一篇《到中西走一走》的文章中描述：“莲吉生堂是花了重金新建的一栋教学楼，礼堂是这幢楼中最神奇的地方：既可以做礼拜，又可以做影戏院，更可供别的聚会用，所以一举三得，真是工程师先生的

别出心裁！新教学楼的二、三、四层都是课室，光纤是十二分的充足，一楼大半是办公室……”这栋新“莲吉生堂”便是今天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校园内的“五四楼”。

当然学校的发展壮大不仅仅表现在新增的建筑物，更体现在教学方面。学校自开办以来，就以教学要求高闻名。中文校名取“中西”二字意为学校旨在培养亦中亦西之“通才”。正因如此，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学校并不提倡某种专门的谋生技能的培养，而是强调“中西并重”。早在1905年校方即规定“中西并重，不宜偏枯”，但还留有余地，如果学生想专修英文，须在入校前声明。1913年则规定：“凡入本塾者皆宜留意于国文科，其专修英文者不取。”至1922年校方更明确指出：“国文为国粹中之一，而亦立国之根基，故本校之于国文，视为学生根本之学。”除了英文、国文，学校还开设了宗教、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家政等课程，其中宗教课占了重要地位，每天都有。所用课本除国文，其他都是美国原版教材。

开办初期，学校采用了美国教学标准学制——十年制。学校的考试制度也相当严苛，设置了70分及格的制度。曾于1933-1952年间任校长的薛正在《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中记载：“在考试方面，实行每六星期考一次的制度，一学期18周，这样，学生每学期有三个考试成绩，期末总评一次，不及格者在校

内公布名单，以示警告，学生都唯恐被列入警告名单，读书都十分用功。”正因如此，早期能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极少，每届只有几人。此外，还有一些未读全部课程即赴国外留学的学生，这其中就包括了宋家三姐妹。尽管她们没有完成所有课程，但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熊月之看来：宋庆龄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她在中西女塾读书时期。重英文、重宗教、重科学知识、重独立人格，中西女塾这些特点，对于宋庆龄素质养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经过多年的努力，中西女塾培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她们中有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女律师，有一批从事科学、音乐、艺术的专家，还有不少投身爱国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女中豪杰。政界、商界、学界、外交界，到处都有中西女塾学生的身影。中西女塾无论在校园设施还是教学质量上都成为近代上海乃至全国一流的学校。



[1] 《中西女塾章程》，1904年版。

[2] 《中西女塾章程》，1920年版。

[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7年。

[4]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七卷，1996年。

[5]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2011年1月。

[6] 《中西女中》，2016年7月第1版

馆藏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致宋庆龄感谢信浅考

撰文 / 葛伟峰

文物简介：“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休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九四四年

上文载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所收藏的一件文物，成书于1944年9月，是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体工休人员写给宋庆龄的一封致敬书。时值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日本侵略者踏入中国的铁蹄即将消亡之时，从文中可以读出写信人对于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于国共关系的忧虑，对于宋庆龄给予爱国者、抗战者以物质帮助的感激之情，对于宋庆龄秉义直言、坚持真理的钦佩之情。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建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命名的。白求恩的名字与他的工作同中国抗战时期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建与发展是分不开的。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在美国洛杉矶的一次晚

宴上遇到了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当时，陶行知为了联合华侨与国际人士支持中国抗战自筹经费在28个国家进行宣传。随后，陶行知向白求恩详细介绍了中国抵抗侵略的恶劣形势，使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迫切地想要到中国去，想要用高超精湛的医术帮助在中国北部和侵华日军展开游击战的中国人民。

^[1]1938年春，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冲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后赴山西五台山，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不久，以晋察冀后方医院第二休养所为基础，建成了一所模范医院，并抽调部队中的医务人员来此轮训。

1938年7月，国际和平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世界代表大会，倡议并决定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伤病员的医疗中心，后定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为筹建国际和平医

院，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捐款2450英镑作为建院资金，并又筹划了950英镑予以支援。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之友社也提供了援助。为此，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兼伦敦《每日新闻》特约通讯员何登夫人受国际和平委员会委托，专程来到中国的广州，与当时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席宋庆龄商谈。9月20日，何登夫人到达广州，经与宋庆龄商议，决定将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山西北部五台山建立的模范医院定为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请白求恩担任院长，同时将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后改称英国援华会）提供的2450英镑和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之友社提供的捐赠送给该院。^[2]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公殉职。延安各界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精神。为了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12月1日颁发命令，将设立在延安拐岭的八路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3]

宋庆龄与国际和平医院

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建与发展，得到了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保盟的大力支持。宋庆龄虽未直接见过白求恩，但她对白求恩在解放区的工作非常关心。关于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经香港冲破重重封锁前往延安的过程，过去有说他们到达香港后，宋庆龄曾当面向他们详细介绍延安抗日军民缺医少药的恶劣情况；

也有说他们到达香港后通过与宋庆龄的联系，经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安排最终到达延安。不论何种说法，白求恩似乎与宋庆龄在香港见过面。但是据馆藏1959年1月6日宋庆龄给白求恩传记的作者西德尼·戈登的回信所述，由于白求恩是“直接去汉口并转赴延安的”，所以宋庆龄本人“从未见到白求恩医生”^[4]这封信纠正了之前几种误解。

在上述的那封信里，宋庆龄还写道：“白求恩大夫是在纽约美国援华会的赞助下来中国的，该组织是和保卫中国同盟有联系的海外机构之一。由于保卫中国同盟是为游击区的医疗工作募集人员、物资和资金的主要团体之一，所以白求恩大夫是在我们的支持下来中国的，我们还尽了一切努力提供他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不过由于是在战争期间，加上国民党阻挠，交通运输极其困难，并且很不安全，所以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满足白求恩大夫的各种紧急的需要。”经宋庆龄联系介绍前往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作为保盟在延安的通讯员、同白求恩大夫的联络员，经常将医疗队对于医药器材的急需情况向宋庆龄和保盟汇报，使得宋庆龄与白求恩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白求恩在最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也是宋庆龄。

1939年3月，保盟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总干事林可胜大夫的提议下，向国际和平委员会提出了希望帮助开办一批有250张床位的医院的愿望，同时提

到了在抗日根据地需要帮助的几所医院的情况。到1940年初，除五台山的晋察冀国际和平医院外，增加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和皖南国际和平医院。^[5]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始终不断地从舆论上向世界呼吁，用医药物资支援中国，而且根据“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原则，千方百计为国际和平医院筹募资金。1941至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儿童、西北计划、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达165.3万美元、2.15亿元法币。其中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有65万美元和1.7亿多元法币。^[6]由于得到外界帮助，这些医院条件相对比当地的其他医院要好，在救治伤员、防治疾病、提高当地的公共卫生水平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到1943年底，这四所医院又都从各自的四周延伸到各自的战场，沿途设立了救护站、野战医院和多个流动医疗队。除医院外，还设有延安白求恩医学图书馆，两所卫生学校和两所制药厂，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国际和平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体系。1945年12月，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谈到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医疗援助时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7]这些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医院，在坚持抗战、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感谢信的由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规模相应扩大，先后迁至柳树店和刘万家沟，收治从抗日前线运来的八路军伤病员越来越多，如刘伯承、陈毅、贺龙、徐向前、王稼祥、陈赓、张鼎丞、傅钟等都曾接受检查和治疗。该医院是一个完全建在窑洞里的医院，曾有国际友人参观该院后说：“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不是现代建筑，也没有精密仪器，许多病人住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挖出来的窑洞里，窑洞一层一层的，一到晚上，每个窑洞透出煤油灯的灯光，在远处看过去，就像一座小型的摩天楼。伤病员由医护人员或农民用担架抬着，从不平坦的小路上攀高进入拱形的刷着白灰的窑洞病房。可医院却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抗战中的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医疗战线的一面旗帜。

1944年9月，前文已叙述的刘伯承、陈赓等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休养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以绢作书，集体签名，遥寄宋庆龄以致谢。自保盟成立，宋庆龄为了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殚精竭虑。为何至此才有这样一封感谢信？1944年，保盟从南洋华侨处募得一台大型X光机，在运抵昆明后。8月30日宋庆龄致函在昆明工作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帕克，洽商运送X光机至西北事宜，但是由于该台设备过于笨重，考虑走陆路运往西北。^[8]当时，国民政府以及地方军

阔对解放区的陆路运输加以封锁，陆路运输显然无法成行。9月在中缅印联合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帮助下，才得以用美国军用飞机将这台大型X光机运抵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周恩来亲自致电保盟表示感谢。这是近亿人口的解放区仅有的一台大型X光机，对于正确诊断并加以治疗带来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9]因此，才有了这封感谢信。书以白绢，寓有纯洁、高旷之意。白绢作书又所谓垂名青史，青史者，书于竹帛之上也。这封书于白绢的感谢信，签名者无不对宋庆龄为了抗战中的军民所做的杰出贡献所钦敬，期望能以此永载史册，所谓“古人日已远，青史自不泯”。

结语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国土沦陷、民族危亡的时刻，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保盟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为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宋庆龄以她在海内外的极高人望，团结国际友人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恶行，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设起获得反法西斯同盟的物资援助的桥梁，并且影响了一大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宋庆龄和保盟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献，其历史价值无论怎样赞颂都是不为过的。她的斗争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更增强了国际和平民主力量间的团结。她为中国、为中华民族、为中国

人民、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与奉献不朽！



- [1] 张世福主编：《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500页。
-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628页。
- [3] 尹著岭著，回荡在祖国大西北的足音，古吴轩出版社，2011.12，第245页。
- [4] 张世福主编：《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455页。
- [5] 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5年8月，第9页。
- [6] 徐锋华著，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 1938—1958，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09，第8页。
- [7] 杜淑贞主编；洪绳之，艾柏英，钱行健副主编；《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04，第153页。
- [8] 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第470页。
- [9] 张世福主编：《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620页。

宋庆龄使用过的摩利臣钢琴 养护纪实

撰文 / 王宁宁

上海宋庆龄故居二楼办公室内陈列着一架钢琴，是宋庆龄居住此地期间弹奏过的。此钢琴为摩利臣（MORRISON）牌立式低背钢琴，纵50.5厘米，横138厘米，高99.2厘米，系摩利臣钢琴厂1937年的产品。经多年开放式陈列，钢琴出现了部分黑键掉落，白键高低不平等为题。为了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我馆于今年请上海钢琴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前来维修保养。经过机械维修整理后，钢琴现在可实现基本的弹奏功能。下文笔者将简要介绍这架钢琴的主要情况、此次维修保养内容以及日常维护措施。

一、品牌介绍

摩利臣钢琴的创始人罗伯特·摩利臣（Robert Morrison，粤语译为马里逊，亦译作莫里森）是英国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1807年他受伦敦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广州，在此期间他一直从事开办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院、印刷出版等事业，是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1834年，摩利

臣被任命为英国首任驻华商务文化副领事，在粤、港、澳他创办的学校引进了首批钢琴进行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他计划在中国制造钢琴，把西方钢琴制造和西方音乐引进到中国，获得了英国皇家和钢琴厂的承诺和支持。回英国述职期间，他四处游说欧洲钢琴厂家支持他，想用自己的名字Morrison来命名新品牌。回到广州后，他开始筹划建立亚太第一家钢琴厂，可惜1834年8月在筹备过程中病逝。

老摩利臣逝世后，他的长子约翰·摩利臣（John Robert Morrison）继承了他的遗志和事业。1841年5月，约翰在香港湾仔荒山为摩利臣钢琴厂选址。1842年亚洲第一家钢琴厂“摩利臣钢琴厂”在香港诞生，工厂从欧洲聘请了大量钢琴技师和工匠，由他们带领当地工人从事钢琴制造。同年第一台摩利臣钢琴在香港出产，成为世界性新闻。这一时期首批出厂的钢琴，大量用于他们父子创办的学校和教堂。正当约翰准备将摩利臣钢琴生产和西洋古典音乐在中国推广开来时，1843年8月29日他因患疟疾突然

在香港病逝，年仅29岁。

摩利臣钢琴这一品牌历经二战、香港沦陷、内战等诸多风雨现今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钢琴制造业，该厂毫无保留地把所有设计、图纸、生产技术等无偿提供给国家，当时的国产钢琴生产很多源自于摩利臣钢琴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和香港工业制造北上的浪潮，第六代继承人将摩利臣钢琴厂搬离香港，迁至广州，现为中德合资摩利臣乐器有限公司。

二、钢琴结构

我馆这架钢琴为20世纪三十年代出产的立式钢琴，当时钢琴生产商们已经简化了制作流程，外观设计也更加简洁，绝大多数立式钢琴没有多余的纹饰或装饰，我馆的这架钢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外部盖板为水曲柳，内部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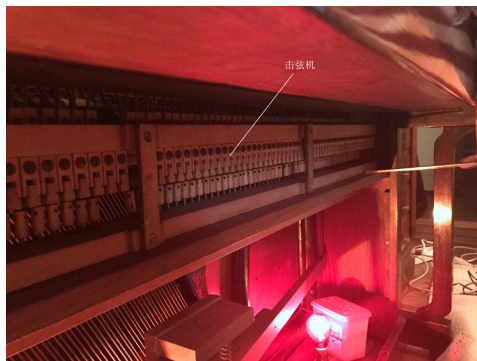
1. 弦轴

琴弦是钢琴发音的主要部分，从低音到高音的每个键上的弦由一根、两根

或三根琴弦组成，它们按音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绷在支架上。每根琴弦的上端固定在琴弦轴上，下端挂在铁骨架的挂弦钉上。当弦的直径、长度不变时，音高取决于弦的张力，而调整琴弦张力的手段即是扭转弦轴。换言之，音准的调校是通过扭转弦轴，继而改变琴弦张力来实现的，因而弦轴又叫调音钉。

2. 击弦机

击弦机连接着琴键和琴槌，现代高背钢琴大部分击弦机都位于钢琴上部，而我馆这台钢琴击弦机在钢琴下部，反映了当时钢琴制造的时代特点。击弦机的基本作用是将击发琴键的动力传递给转击器和制音器，从而完成琴槌击弦，制音器离弦。击弦机是击发琴弦振动的主要部件，因而是整部钢琴的灵魂和最重要的配件。



3. 琴槌

琴槌间接与琴键相连，当琴键被按下时，琴槌接收其经由击弦机传递的动力打落在琴弦上，借着琴弦的振动使钢琴发出声音，它的作用就是敲击被弦轴紧扣着的琴弦。琴槌由羊毛缩绒成毛毡

后再与木材粘接制作而成，在低音部琴槌厚而较软，到高音部变得薄而硬，它的形状、重量、弹性对钢琴的音量、音色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4. 制音器

制音器与弦紧贴着，用来阻止弦的振动。当钢琴上的琴键被按下时，钢琴内部的琴槌会打在一条条琴弦上，借着琴弦的振动发出声音，制音器是由软而厚的呢子制成，它把振动的琴弦压住，其作用就是制住那些不必要的、琐碎的声音，以避免未弹奏的琴弦引起共鸣。高音区的琴弦较短，频率较高，琴弦振动停止较快，因此没有制音器。



5. 琴键

琴键由黑键和白键组合而成，黑键36个，白键52个，共88个。宋庆龄使用过的这架钢琴琴键为松木制成，外贴塑料片，一头用卡钉固定，一头贴在木头键盘上。琴键可分为7组，每组为一个八度，有7个白键和5个黑键，五个黑键填充在两个全音关系的白键中间，使得钢琴上所有相邻的琴键之间都是半音关系，也就是十二平均律。最中央的一组

叫做“小字组”，比小字组高的5个音组命名为“小字1组”至“小字5组”，比小字1组低的音组命名为“大字组”、“大字1组”、“大字2组”。

三、修复过程

我馆钢琴经过长时间的开放式陈列，现阶段主要出现了以下问题：部分黑键掉落，白键高低不平，琴槌严重变形，音准严重失调等，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修复技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整理。

1. 修复掉落黑键

此次掉落黑键共四只，皆因陈列时间过久脱胶所致。分别为大字1组#D（升Re）、小字1组#A（升La）、小字2组#C（升Do）、小字2组#D（升Re）。修复前技师打开钢琴盖，卸掉钢琴顶板，使用琴键特制胶水，分别涂于掉落的黑键和原黑键底部表面，而后进行粘合。粘合后的黑键牢固整齐，达到了较好的展示效果。



2. 调整白键高低

除黑键脱落外，整架钢琴白键还有多处高低不平现象，这是琴键底部木条螺丝变形造成的。技师从低音区到高音

区反复检查，对明显低落琴键加放垫圈，对明显高出琴键减少垫圈。反复排查，共调整白键十余只，修复后的琴键较为平整美观。



3. 修复变形琴槌

钢琴上部盖板打开后，技师发现琴槌部分因热胀冷缩严重变形，我馆钢琴击弦机位置调整部分在钢琴下部，故技师打开钢琴下部门板，用特制扳子逐一调整击弦机旋钮。经过整理后，琴槌排列整齐划一，为下一步调音做好了准备。

4. 调律保养维护

调律是此次维修保养的重点。在调律时，技师手击琴键力度为弹琴力度1-2倍，这样调出的音扎实，音准较稳定。钢琴调律是逐个音、逐根弦调试的过程，而且钢琴的音多数为同音弦组构成，即一个音由一根、两根或三根弦组成，调律时需将暂时不调试的弦止住，防止其它弦发出不必要的声音，以免干

扰被调试弦的音响。因而从中音区域开始，技师使用止音呢带将弦隔开，通过调音扳手转动上方弦轴来调律。高音部分用止音呢楔隔断调音，最后调低音部分。经过细心地调律，钢琴现可实现基本的演奏功能。



四、日常保养

我馆钢琴作为文物展出，平常亦得到精心的维护与保养。目前，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温、湿度的调整

钢琴摆放地点的适宜温度以23度左右，相对湿度50%左右为宜。环境的温、湿度，尤其是湿度，对钢琴的音准稳定、机械性能以及使用寿命等方面影响非常大。上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度很大，钢琴较容易发生部分金属机件生锈、呢毡等发霉、琴键不起、木质零件变形等故障，所以适宜的温湿

度对钢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钢琴存放在主楼二楼办公室内，春秋两季注意通风，夏冬两季开冷暖空调调整温度，降低湿度，同时在钢琴下部放置除湿剂除湿。另外钢琴放置时不能紧贴墙壁，钢琴背板与墙壁之间保留了约45mm左右的距离，起到防潮的作用。

2. 日常清洁

文保人员平时使用干燥的鹿皮或者棉布擦拭钢琴，切忌使用毛巾之类的化纤制品擦拭钢琴表面，这样会在钢琴表面划出细微的伤痕，使钢琴失去光泽。当钢琴表面发现积灰时，不能着急擦拭，以免灰尘微粒对漆造成不必要的划伤，此时可使用柔软棉布或软毛刷清除灰尘，再用软布小心擦拭即可。我馆钢琴琴键的键皮采用塑料制成，擦琴键时不能用酒精棉球等试剂擦拭，用略潮湿的棉布清洁即可。

3. 防虫、鼠

钢琴的日常保养中，文保人员除了保证钢琴基本清洁、防止钢琴存放环境

过潮外，还在钢琴内安放了驱虫药剂。老鼠一般会通过踏板下面的孔洞钻入钢琴内部，啃咬击弦机上的木质零件。像我馆这样长期不使用的陈列钢琴更容易被老鼠噬咬，因而文保人员会定期打开钢琴的顶盖和下门检查，预防老鼠造成损害。

宋庆龄使用过的这架摩利臣钢琴年份已久，踏板存在锈蚀状况，内部钢丝老化。因钢琴弹奏时一根钢丝要承受十几公斤的张力，所以目前该钢琴已不适合过于激烈的演奏。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这架钢琴不宜过多干预，以后每年可请专业技师对钢琴进行保养调律，保持外观和基本功能的使用，延长钢琴寿命，让观众在故居更好地感受宋庆龄热爱音乐、享受音乐的生活态度。

关于演示文稿的二三事

——简析演示文稿的发展轨迹

撰文 / 许毅捷

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际，笔者发现将演讲汇报的文稿进行可视化呈现，即制作演示文稿，已成为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能够更好地将文稿在画面上加以呈现，更好地配合演讲的进行，势必成为工作成效提升的一个关键。撰写此文主要就是与大家分享在演示文稿制作过程中不断总结归纳，不断探索实践的理论新成果，希望对大家的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演示文稿的功能

要弄清楚演示文稿的功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正本清源，追溯演示文稿的起源。笔者认为，演示文稿的前身，应该是课堂上的板书，并不是宣传标语或黑板报。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依托于讲义而存在的，而后者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同理，演示文稿多数时候也是无法独立存在的，是需要依托于演讲稿才能成立的。相反地，并不是每一场演讲都有演示文稿的，那么演讲即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演示文稿对于演讲而言，起到的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具体来说，即在听演讲的同时，通过生动直观的画面，揭示演讲内容的逻辑关系、减少歧义，以达到表达准确的功能。如何运用这一辅助功能呢？笔者归纳了以下三个层次：

1. 字幕阶段

就是演讲稿的文字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屏幕上，就当下对于演示文稿的审美要求来看，字幕式的演示文稿似乎不太能被接受，但不能否认其在减少歧义方面是有所功用的，特别是在标题呈现、数据呈现、照片说明等处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

2. “有图有真相”阶段

即补充材料支撑阶段，对文稿内涉及的内容、事件，使用相关的图片、视频直观有力地进行说明，力求使演讲更有说服力，这也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形式，甚至被认为是演示文稿唯一存在的意义；

3. 展示演讲的逻辑关系阶段

提到演示文稿中的逻辑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流程图，这种常识性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以内。那除了流程图，我们还可以用演示文稿展示什么逻辑关系呢？一是可以通过目录页、节标题页来展示顺序关系，直观地展示给受众这个演讲的进度；二是可以通过动画编排来展示先后、总分等逻辑关系，这个隐藏的功能被运用得不多，实际操作下来，对于整个演讲逻辑性的诠释作用非常明显，并且显得整个演示文稿风格统一，整体性强。

就笔者的经验而言，以上三个层次的运用是相互兼容的，并不是排他的，若能够自如地将这三层次的功能熟练运用，定能将演示文稿的品质上一个台阶。

二、演示文稿从模板套用到高端定制

时至今日，相信很多人在接到演示文稿制作任务之后，第一步还是找一个自认为很合适的或者喜欢的模板，然后直接套用。的确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做出来的作品也是可以完成任务的，恕我直言，这样的作品并不能体现高级感。且不论这个模板别人下载了多少次，可能重复的问题。作为受众而言，审美品味是在不断提升的。举个例子而言，2016年大热的影视作品《欢乐颂》，在2017年《欢乐颂》（2）播出

后，却广受诟病，同样的制作班底，同样的作品品质，效果却相去甚远，这就是观众的审美升级了，那么，五年前你在套用模板，如今你还在套用模板，不再有新鲜的视觉冲击力，受众自然不会为此买单。要能够做出吸引人的演示文稿，必须在审美上领先于大众的品味，才能战胜受众的审美疲劳。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笔者找到了“高端定制”的方式，使演示文稿与整场演示更为契合，使受众感受到演讲者团队的用心。

如何体现定制，笔者认为要在演示文稿以外下功夫，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考虑因素：

1. 场地

如果有可能，笔者都会去演示现场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是投影还是显示器，座位是阶梯的还是一般的，这些都对演示文稿的设计排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举例而言，没有阶梯的一般会场，考虑到后排观众的视线会受到前排观众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尽可能减少在演示画面下1/4画幅的内容，以照顾到全场的受众，至于这1/4画幅要怎么显得自然以后有机会再整理一些案例跟大家分享，但至少要有这个考量。除此之外，还有投影仪的色差之类的，也是需要事先了解的；

2. 演讲内容

演讲内容往往决定了演示文稿的基调，就目前笔者所接触的演示文稿项目的经验来看，政务使用冷色调，党务使

用暖色调，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颜色运用，一般不太会出错，相反地，深受时尚界偏爱的性冷淡色及低对比度颜色，在机关演示文稿中运用的案例比较少，比较难以把握；

3. 演讲人

演讲人的气质决定了演讲现场的氛围，最基本来讲，男性演讲人和女性演讲人的演示文稿基调是要有所区别的，比如，可以用字体来进行彰显，适合于男性的字体方正一些，适合女性的字体圆滑一些，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演讲者或儒雅或大气或端庄的气质进行调整；

4. 受众

要考虑到大多数受众的接收习惯，比如专业观众，整个动画设计需要简单沉稳不幼稚，而一般观众，则希望看到生动活泼有明显运动轨迹的动画形式，来揭示演讲稿的逻辑关系；

5. 演讲目的

演示文稿中使用的图片、视频的数量、排版是由演讲的目的来决定的，而不是有什么就放什么，体现数量多的情况下，可以以图片组或快闪的形式出现，而为了体现具体某一事物的具体细节的时候，只需要单一的图片，将观众的注意力留给演讲本身，这里面的尺度掌握需要演示文稿制作者对于演讲目的的充分把握。

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一一举例说明，但相信只要有这五方面的考虑，就

是迈出“高端定制”的第一步。

三、演示文稿不仅仅是 PPT

行文至此，一定会有人觉得笔者就是在聊做PPT，但是再回过头去看一下，却发现笔者一直是在用“演示文稿”这个词，这并不是为了凑字数，而是笔者在今年开始尝试用keynote来制作演示文稿了，恰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 Keynote 演示文稿应用开始界面

Keynote是乔帮主制作的一款基于苹果系统运行的演示文稿制作软件，其最大的卖点就是力求制作电影级别的动画，使用下来的感受也是的确比PowerPoint的动画更灵动多样，除了第一眼的酷炫以外，也可以看到它在逻辑呈现上给了制作者更大的空间，给受众更好的感官体验。但是基于MAC系统并不是机关配置的主流，仅仅作为外挂般的存在，回到现有的Powerpoint，还是要多做多用，了解它的每一个功能，才敢大胆设想每一个效果。

四、结语

回顾总结每一个制作的演示文稿，不免感叹制作演示文稿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过程，由于时间的限制、素材的局限、软件使用的不熟练等等各种因素的左右，最终在现场演示的版本往往是那个“将就”的产物，但也是因为这一“将就”的属性，在完成演示之后作品存在的问题不足显而易见，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方案，就标志着一次进步。

从近年来演示文稿在工作成果展示中权重越来越大的趋势来看，是顺应了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我们正经历着“读图时代”，真正能够吸引注意力的不再是冗长的汇报稿、发言稿，而是将这些文稿用可视化手段生动直观地展示给读

者，使受众能够在短时间内对于一个陌生的领域、陌生的专业范畴有所认知，演示文稿起到了极大的桥梁作用。每一次变革都有不同的声音，对于此波风潮仍有人嗤之以鼻，认为这一风潮，幼稚化了文字本身的属性，使得语言产生钝化现象，太过具象的画面也剥夺了文字这一抽象符号留给受众的主动思索空间。但不论是否认可这一现象，不得不承认“文稿的可视化风潮”是不容忽视，并且我们已经积极投身在了这一风潮当中，这是身处“读图时代”中的我们无法抗拒的时代车轮。既来之，则安之，了解掌握演示文稿的特性，熟悉操作演示文稿制作工具，享受制作演示文稿的过程和完成后的成就感。

基于“小小演说家训练营”活动 对故居类场馆开展同类型未成年人 教育活动的思考

撰文 / 高雨寒

摘要：今年暑假，本馆开展了一次“小小演说家训练营”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故居深度游、故事比赛、小小讲解员三部分，旨在提升小朋友的参观体验，同时，让活动尽可能为小朋友带来能力的提升、文明意识的提高、价值观的积极影响等更长远的价值。那么，对于故居类场馆来说，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活动目标呢？笔者认为，这离不开活动形式的组合与有效的活动引导。本文将简要阐述本次训练营活动中三种活动形式的组合原因，并主要结合这三种活动形式对活动引导的方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小小演说家训练营 故居类场馆 未成年人教育

今年暑假，有一群三年级左右的小学生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这里一起“写”下了故居演说家的速成日记。想要成为故居的演说家，自然要先了解故居。这群小朋友在这里度过了四天，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带领下，先后了解了纪念馆概况、宋庆龄生平以及宋庆龄在这里的故事等内容。此外，大家还一起参与了“如何文明参观博物馆”、“如何让朗读更动听”等主题探讨。这次活动是将故居深度游、故事比赛、小小讲解员三种活动形式相结合的一次训练营。通过丰富的活动形式，让小朋友在短期内对宋庆龄产生较为深刻的印

象，并基于这一印象，不断探讨和尝试什么是优秀的演说、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志愿者。

很多场馆都曾分别开展过故居深度游、故事比赛、小小讲解员这样的未成年人教育活动，我馆也不例外，那为什么这次训练营要将这三种活动形式结合起来？这就离不开本次活动的目标和这三种活动形式的内在关系。

本次活动旨在提升小朋友的参观体验，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们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促使参与者获得以表达能力为主的能力提升、文明意识的提升以及价值观的积极影响等更长远的价值。

这三种活动形式的组合与基础目标的关系较为明显，笔者不再赘述。就给参与者带去长远价值这一目标而言，笔者认为，这与活动形式、引导方式均有紧密联系。

一、表达能力提升

本次活动的能力提升以表达能力为主。但为什么要设置故事比赛和小小讲解员这两项锻炼表达能力的活动呢？

在参与过程中，故事比赛的听众和表达者均以静态为主，更关注单个故事或主题的内容深度；小小讲解员的则均以动态为主，听众更关注于多个展品的基本解释。因此，在参与这两项活动的时候，参与者准备的题材内容不同，提升的方向也不同。作为短期训练营，将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能让参与者接触不同的表达环境，为他们掌握更全面的与表达能力提升相关的知识提供基础。

在活动形式的基础上，引导方式是提升能力的关键。在故事比赛中，笔者认为让小朋友自行探讨并体验优秀演讲的必备条件是这一活动的重要引导。这种思考可以促进小朋友在准备演讲时、演讲结束后都能较有针对性地提升演讲能力，也有助于他们找到其他能力提升的方式。而在小小讲解员中，除了探讨优秀讲解的必备条件外，小朋友在讲解时一般需要克服的是面对公众表达的紧张情绪和面对观众随机提问的不确定感。在讲解结束后，可借助对志愿服务

的原因探讨与小朋友进行沟通，以培养他们对每次服务效果差异性的接纳能力，引发他们努力学习知识的动力以及为他人服务的兴趣，进一步提升表达能力。

二、文明意识提升

文明意识提升在本次训练营中主要借助讲解志愿者这一活动载体来实现。

很多小朋友在讲解时很投入，不会发生不文明现象，然而在讲解之外的时间，很容易奔跑、喧哗。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小朋友意识到志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需要他们认识到文明参观的原因。

志愿者对于场馆来说，不仅是服务者，也是让游客规范参观的提醒者。想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志愿者，需要在文明参观中起表率作用。在这一环节的引导中，小朋友自己虽然容易规范行为，但也很容易因此产生指责别人的行为，这时引导他们培养包容力十分关键。意识到志愿者身份从而规范行为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可以处理小朋友突发的不文明现象，但想要真正培养他们的文明意识，则需要解决他们不理解文明行为这一根本。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采用换位思考的引导方式，并基于此，让参与者对文明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思考、探讨，这有助于他们理解文明行为的重要性，进一步产生认同感并自觉落实。

三、价值观积极影响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正是影响学习者日后能否应用它们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生存、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如何让活动的参与者能够较好地掌握知识，是达到该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故居深度游这一活动形式来说，主要是为了基本消除参与者看不懂展览的情况，帮助他们从陈展内容中获取基本知识，在脑海中留下对陈展内容及对象的大致印象。对于成人而言，使用常规讲解基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对于小朋友来说，理解伟人的一些事迹不太容易，深度参观体验可以用以解决。

具体来说，要把对小朋友来说的未知变成他们熟悉的事物，即增加他们对全新的或有难度的材料的理解和内化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多采取对比、类比的引导形式^[1]，让他们通过联想记忆来理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有意识识记方式，掌握陈展脉络。在比较的运用中，可以将小朋友自身课余生活与伟人青少年时期的课余生活进行对比，找到共同点和不同点，不同点的产生又与什么有关等。借此帮助小朋友理解陈展内容，了解伟人以及伟人所处的时代，从而获取基本的参观知识。在有意识识记中，可以将参观内容分段并制定阶段和总体目标，从而把握陈展脉络，有目的地参观、掌握知识。

在故居深度游中，讲解、游戏等方

式都可以结合比较及有意识识记来提升知识获取的效果，掌握基本陈列信息。

故事比赛主要通过为参与者展现一个更加生动的人物来补充他们对伟人的了解，激发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比赛使用的材料多是展现一件事情的具体情节，这种故事具有代入性，能让小朋友在脑海中产生更加具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活动中，由于故事材料有限，活动方可以对故事背景、人物作简要补充，以帮助小朋友理解，同时，可以建议参与者在学习时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以加深他们对故事的掌握。

小小讲解员主要基于讲解词来获取知识。通过对讲解词的背诵和服务中的不断运用来加深对伟人的了解。背诵时，死记硬背是小朋友经常容易采取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带来的效果却并不太理想。为缓解这一情况，小小讲解员这类活动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指导参与者掌握一个较有效的背诵讲解词的方法。笔者认为，可引导参与者先从归纳段落大意、讲解词主线开始^[2]。这有助于他们打好讲解基础、扎实掌握知识。就名人故居类讲解词来说，主要内容离不开名人的生平。这种生平一般以时间、地点或主题为主线，但不论主线是什么，各部分内容会有一定目的性，内容间也会有潜在的逻辑性。这种方式有助于参与者了解讲解词大纲及其间的逻辑关系，如递进、并列、转折等，促使他们把握讲解脉络、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

掌握讲解内容，同时培养一种思维模式，从而使他们在面对其他材料时，也能更有效地进行记忆^[3]。

就讲解服务来说，服务中小朋友一般会很投入，讲解结束则容易放松下来，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物上。这时，引导他们对服务情况进行回顾十分重要，这是能否提升讲解水平与知识储备的关键。回顾时，可以让参与者们记录下服务时表现好的、不足的地方以及游客提出的无法解答的问题，并借助自行思考、询问老师、阅读课外书籍等方式改善服务、解决疑问。此外，每次服务结束，还可以由老师设立当日成长小目标，以引发小朋友的学习兴趣，保持服务新鲜感。这两种引导方式都可以帮助参与者巩固知识、提升储备，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综上所述，故居深度游是让参与者获取基本策展信息的活动方式之一，引导中可采用比较及有意识识记的方式，来提升获取信息的效果。故事比赛与小小讲解员均为参与者提供锻炼表达能力的平台，分别通过更生动具体的故事情节及对讲解词的背诵与运用来扩展、加深对伟人的认识。这两项活动中可结合各类主题探讨让参与者找到提升表达能力的方向。小小讲解员活动可同时采用换位思考培养参与者文明意识，归纳讲解词大纲、回顾服务情况、设立成长目标这三种引导方式促进参与者巩固、学

习知识。

想要让与“小小演说家训练营”同类型的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为参与者带去能力的提升、文明意识的提高、价值观的积极影响等更长远的价值，活动形式的选择与组合是基础，适当的活动引导是关键。本文所提到的活动形式、引导方式也是笔者的经验总结，具体还应结合场馆特色、活动对象等进行适当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为未成年人提供快乐成长的平台。



[1] 布鲁斯·乔伊斯(美)，玛莎·韦尔(美)，艾米丽·卡尔霍恩(美)，兰英等译，教学模式(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233页。

[2] 赫尔曼·艾宾浩斯(德)，常春藤国际教育联盟译，记忆力心理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5页。

[3] Bascones, J., & Novak, j. (1985). Alternative instructional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blem-solving in physics.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7(3), 253-261; Maloney, D. (1994). Research on problem solving: Physics. In D.L. Gab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cie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327-354). New York: MacMillan.

《索尼娅的报告》选译

译文 / 张黎 摘录 / 符朋

[译者按]

鲁特·维尔纳 (Ruth Werner, 1907-2009), 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 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 在上海加入佐尔格小组, 1948年将英美原子弹资料提供给苏联, 50年代起成为闻名于世界的作家, 1990年她的书《索尼娅的报告》全文出版, 震惊了整个谍报世界。



▲ 鲁特·维尔纳

鲁特·维尔纳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 23岁时(即1930年)随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在上海, 她结识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通过她又陆续结识了鲁迅、宋庆龄、丁玲、董秋斯夫妇、陈翰笙夫妇等。经史沫特莱介绍, 她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有“红色间谍”之称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 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

成员, 对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先后在上海、沈阳、北京三地从事情报工作达五年之久, 后转战欧洲。从事情报工作二十余年, 她在无形战线上做出诸多杰出贡献。笔者此次将《索尼娅的报告》中其上海结识史沫特莱、鲁迅、理查德·佐尔格、宋庆龄的片段摘译出, 以提供这几位人物性格材料为学界研究所用。

前言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朋友们:

我在你们美丽的国家生活了五年,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年轻共产党员。那是在1930-1935年。

我结识了理查德·佐尔格, 后来他在日本被绞死。他是我的老师和我的

榜样。

今天人们在日本给他平反了，因为人们大概已经认识到，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反对战争危险。

杰出的革命新闻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是我的朋友，她为你们的国家做过许多工作。

我与孙逸仙夫人曾经有过某些诚挚的交往。我也见过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7年，我曾经以很大的兴趣随同一个老战士代表团访问过你们的国家。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事为我找到了我当年居住过的地方。我满怀激动的心情走进那栋旧的行列式住房，走进理查德·佐尔格与学者陈翰笙，与王和其他同志秘密会面的房间，就是在这一间屋子里，我曾经给我刚刚出生的儿子哺乳和洗澡。今天他已经67岁了！我再一次站在这个房间里，两眼充满泪水并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为我们的目标：和平，大家有工作，大家有文化并过上体面的生活的奋斗中取得成功。

你们的鲁特·维尔纳
柏林1998年12月4日

卷一 短片

一

普劳特^[1]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德国时，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读过她的《大地之子》，在

这本书里她描写自己那充满辛酸与贫困的生活。艾格尼斯是一个非技术工人的女儿，她父亲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是作为刷盘子女工和摘烟叶女工挣钱读大学的。后来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大学里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过，参加过那里的革命活动。关于她的生平，我在柏林时，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还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时党在波茨坦广场组织了一次大型书展。扬·赫特菲尔德负责布置展览厅。每天晚上我们的宣传鼓动队都在那里演出。展览搞了4周，从14点到22点开馆。

有一次两个印度人来到我的书摊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大地之子》卖给他们，还讲述了书的内容。我详细地讲述了艾格尼斯跟一个印度人结婚，后来又离婚的事情。二人当中那个年长的说：“全都对，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结婚的那个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记者在中国工作，她自己却左倾得多。我很想认识她，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我去接近在我看来如此了不起的人物。

普劳特知道我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我介绍给她。我记得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岁，身高 1.70米，黑头发，大鼻子。”她纵情大笑，回答说：“34岁，中等身材，无特殊标志。”

次日是11月7日，俄国革命13周年。我为我们的住宅买了红玫瑰，至少提醒

自己记住这一天。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庆祝11月7日多么好啊！

我们约好在市中心见面，立即互相辨认出来。艾格尼斯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跟我家的红玫瑰一模一样，她要把它送给塔斯社的代表，祝贺11月7日。

我记得，我们坐在震旦饭店的咖啡厅里，艾格尼斯刨根问底地盘问了我一通，由于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欢她，自从在上海生活以来，我第一次丝毫未隐瞒自己的世界观。我提到我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请求她帮助我建立联系，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党员。

关于这次会见，我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来像一个聪明的女工。穿着朴素，稀疏的棕色头发，非常活泼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张虽然不漂亮但却端正的脸庞。当她往后梳理头发时，人们可以看见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额。她在这里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来往，因为艾格尼斯彻底伤害了他们。当年她抵达上海时，封建的美国俱乐部为她举行了一个茶会。艾格尼斯去了，她对一切中国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她问是否有中国人参加，回答说：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会员。她又问道：也没有中国人顾客？回答说：中国人不许进俱乐部。听了这话，她起身走了。

英国人最恨她，因为她从前为印度革命运动工作过。

中国在一步一步地观察她，尽管她确实是《法兰克福报》驻这里的记者。

艾格尼斯和我成了亲密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互通电话或者见面。

1930年11月12日

星期天晚上，我们去艾格尼斯住宅接她时，我径自扑向她那些德文、印度文、中文和英文书籍。然后我们跟她和两个中国朋友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其中一人是一个学校的中国文学教师，另一个是她的秘书。

艾格尼斯的秘书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女作家丁玲的伴侣。我也认识了丁玲并取得了她的信赖。她曾经长时间在中国红军里。我遇见她时，她正积极地在新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工作^[2]。

关于1930年的圣诞节，我曾经这样写道：

晚上10点钟我们和艾格尼斯进了一座中国剧院。最著名的中国演员梅兰芳正在上海进行旅行演出，这是一次经历。他扮演的是女人角色，他是那样妩媚和漂亮，你简直无法描述。开始有片刻时间，人们需要克服这是一个男人在表演的想法……首先是所存的赠品。书籍：高尔基的《一个人的诞生》；米勒的《如果我们1918》；爱伦堡的《汽车的生活》；谢夫林娜的《维丽涅娅》；《中国短篇小说杰作》；埃里希·凯斯纳的《一个男人的答复》；皮佩尔出版社的《艺术年历》；孔·维因纳的《亚洲》；斯丹达尔的《帕尔玛修道院》；佩克汉默的《中国》；豪森斯坦的《当代艺术》；安德雷·莫洛亚的《拜伦》；里尔克的诗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北纬四十二度》。

1931年1月6日

我们的图书馆里突然增加了5本马利克出版社^[3]的图书，对此我们一点都不伤心。艾格尼斯请求我给一家杂志写一篇关于上述5本书的书评，为此我可以保留这些书。

关于这家杂志和它的主编，我在给家人的信里没有详细描述。它当时的名字叫《奔流》，是由中国作家鲁迅主编的，它的名字必须经常变换，要么只能秘密出版。

后来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当然都是用的笔名。我还记得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德国工人手里的毛笔和钢笔》，我写的是关于20年代工人作家和工人画家的事情。

我常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和他的小儿子生活在一起。

鲁迅，生于1881年，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像高尔基一样，他描写普通人民，描写他们的尊严和痛苦。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长相也颇似高尔基。他有一张端正、苍白、敏感的脸，当时已经得了肺病，1936年死于肺结核。

鲁迅生活得十分俭朴，有一次我送他那大约只有三岁的儿子一只带轮子的木鸭子，这位父亲十分感动，一再说：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礼物呀。

鲁迅想出版一本凯泰·珂罗惠支^[4]的画册，我帮他搜集了那些画，后来他赠我一册，还写了一句友好赠言。由于我对珂罗惠支评价颇高，又十分尊敬鲁迅，这份礼物对于我来说双倍珍贵。这本画册在后来的战乱中丢失了。

1931年1月14日

昨天我整整忙活了一天，把艾格尼斯为《法兰克福报》写的一篇7页打字稿长的文章译成德文。是关于中国农民和红军的。法兰克福方面的译员在她的上一篇文章中犯了一个大错误^[5]，所以这次她请我来翻译。

在最初的时间里，我们的友谊对于我是十分重要的，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像艾格尼斯这样的名人，居然愿意经常和我在一起，我怎么会成为她所信赖的人呢？

艾格尼斯是一个独身女人，她经历过充满革命斗争的丰富生活。我是个共产党人，但我在物质上是无忧无虑长大的，在面临着生第一个孩子，对此我非常高兴，我生活在精心呵护之中。除此之外，我比艾格尼斯年轻得多，我还没有经验。

艾格尼斯有着十分突出的个性，她以自己所写的书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她为中国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很大牺牲。同时她也是个不稳定的人，她常常表现得很风趣，以她的幽默来感染人，但也更经常表现出压抑、沮丧的心情，这一点影响了她的健康。也许她需要我的沉着和我的乐观主义。除此之外，我总是为了她存在的。只要她感到寂寞，便来拜访我。凡是在她感到沮丧的时候，夜里3点钟给我来个电话，我也会立即起身到她那里去。

我们的友谊刚开始不久，艾格尼斯就告诉我，她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是和我们一致的，但是服从我们党的纪律，对于她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也许是由于地下工作的缘故，她不

愿意向我透露自己的党派属性。但是，我依然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尊敬艾格尼斯，世界上很少有像她这样的人，对我的发展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但是，每当她那自发的感性反应，影响了她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时，我便表示不赞成她的意见。一旦我们之间发生争论，她便怒气冲冲地走出去。几个小时之后，她便打电话找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又对我好了，我也高兴。

在她的《中国胜利》那本书里，艾格尼斯说，她始终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积极支援了中国革命，但她从来不是党员。这本书是维克多·高兰仕出版公司出版的。

许多年以后我再一次通读了她的书，我发现《大地之子》这本书包含了她的许多苦闷、彷徨和自发的行动，这是我年轻未曾意识到的。

1931年3月19日

……你问我有多少朋友。我们没有多少朋友，但有许多熟人。在朋友当中，除了圈外，自然首推艾格尼斯……

1931年10月4日

……艾格尼斯迁入一栋公寓大楼，有了自己两间一套的住宅，距我们只有两分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罗尔夫^[6]装修了住宅，设计了所有家具。当然一切都应是俭朴的，可他那些图纸占去许多地方。

1932年3月6日

……艾格尼斯又生病了，她下周进医院打针，对她的心脏进行照射治疗。主要是神经紧张，她埋头于正在写作的这本新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许多我们共

同的朋友都出现在这部书里，我们常常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但我不能透露得太多。我相信，这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最近两夜我睡在她那里，只要有人夜里和她住在一起，她就感觉良好。

我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谈了许多关于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对我今后生活产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

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她说，假如我同意，她可以为我寻找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二

这位同志来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理查德·佐尔格。艾格尼斯知道左尔格博士同样也在为德国新闻界写作，她觉得在新闻工作之外支持左尔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与他见面时，艾格尼斯并未在场，只有我自己。她只是为我们初次会面当了中介人。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尔格的活动。

我用不着描绘这个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出现过。他第一次来拜访我，是在1930年的11月。当时，我们还住在瓦尔特^[7]家里。理查德·佐尔格当年只有35岁，我也同样觉得他的确像别人描绘的那样，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

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

我现在之所以要描绘一番理查德·佐尔格，也许是因为不在眼前看着他，就无法想象他的样子。

我们初次会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理查德说，他听说我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谈到了反对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斗争，他谈到责任，谈到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会遇到的危险，他劝我再想一想这件事情。现在我还可以拒绝，无论谁都不会埋怨我。

他看出来我正怀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过我怀孕的事情。

听他问我能否在危险情况下参与工作，尽国际主义义务，我觉得受了委屈。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万一遭到拒绝，可不是个人的事情。在我以某种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理查德沉默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仔细谈了在我们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我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据我的记忆，后来一个叫“保尔”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惊讶的是，从我与艾格尼斯第一次会面，到理查德来访，在我看来这段时间是很短的，他是怎样如此迅速地了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记得理查德建议我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去观看一次游行，不必直接参加进

去，扮做购物的样子，作为欧洲人证明我在现场；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货商店门前，看见许多中国人遭殴打，被逮捕。

在多数情况下，被逮捕即意味着死亡。我注视着那些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年轻人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会为他做任何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在那里看见了我，我们在柏林曾经有过一面之交。他让同志们提醒我，往后再遇见这种情况，要把自己打扮成贵妇人模样，比如说戴上一顶帽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中国，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里见过他。

结识理查德之后，我听说他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欢迎我参加工作。

理查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看，更换是不利的，但是他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理查德这里并参加了他的小组，我丝毫未考虑这个小组要执行什么任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参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

对我来说丝毫没有改变。我知道我的活动是支援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的同志的，而且这种支援是从苏联来的，我觉得这更好。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我们住在瓦尔特家时每一次会面的情形，但是我为这个小组所做的工作，从与理查德谈话之后，就在那里开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2月，我儿子过生日时，理查德向我表示祝贺，

我一方面由于自己忙于生孩子这类私事而感到难为情，另一方面又不无骄傲地把他领到婴儿床旁边看儿子；他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推动弹簧床，长时间地，默默地观察着孩子。我当时想，他大概还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呢。

瓦尔特帮助罗尔夫在上海谋到了他的职位，还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了我们，我在他家做地下工作若是被发现，可能会毁了他那前程远大的职业生涯，甚至更多。关于我的工作，我必须保持沉默，一旦他知道了，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危害。

瓦尔特是一个成功的、顾体面的生意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实在的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是了如指掌的，当他需要它的物质可能性时，他会以嘲笑的态度说些风凉话。他对自己能从底层晋升上来感到骄傲，他有意识地继续晋升。瓦尔特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同情中国。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进行过无数次交谈，在这些交谈当中，我成功地影响了他。瓦尔特作为罗尔夫的朋友，我从18岁时就认识他，他也知道我从前的政治态度。尽管如此，他对我在上海的活动却一无所知。我相信他从未想到我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政治上会如此积极，因为在他看来，这太冒险，太不可思议。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名字，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伪装。另外我们也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理查德建议我弄一个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我本来也打算

搬家，于是我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我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1931年4月1日，我们迁到那里。我们的地址是霞飞路1464号，后来改为1676号。

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两条或者三条不同的大街。

理查德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我这里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理查德之外，还来两个或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来一个或者两个另外的欧洲同志。我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我只是警戒着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会面是在二层楼进行的，下层的房间不安全，怕来客人。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参加会面的同志们不是全都在同一时间来，走出我家时，他们也同样是间隔开来陆续离去。理查德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总要与我谈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与他的相识，必要时可以通过我们二人与艾格尼斯的相识说明。他偶尔拿一份新闻稿来让我抄写，当做他来访的借口。此外，欧洲人总是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互相之间的来往几乎用不着说明。实际上，除了我们小组的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的拜访，尽管在这两年里他来过我们这里至少有80次。

在最初的几周里，一旦他为了跟我聊天耽搁时间久了，我表现得颇为拘

谨，因为我不愿意显得多么好奇。我的确不是这样，而且也绝不因为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自己却几乎毫无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从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可是这种要表现出不好奇的愿望使我心神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和理查德谈谈。而当他问起来时，我的回答却十分简单。

在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经过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我不礼貌地说：“时间到了，你该走了。”（理查德是惟一我不用“您”称呼的人。）他站起来，拿上帽子说：“看样子，我要被轰走了。”我低头未语，

翌年春天，我儿子大概已经两个月了，理查德突然问我，愿不愿意跟他骑摩托车出去兜风。我们在离我家不远的城市边缘会面，我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骑摩托车，他还得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坐得牢固，双脚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后，理查德躺在医院里，腿上打了石膏，当我去探望他时，同志们告诉我，他总是超速行驶

这种飞驰一般的行驶令我十分振奋，我反复喊着加油啊，他也满足我的愿望。当我们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停下来时，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可恶的上海社交生活，什么要不断成熟起来，什么地下工作的责任和对十分娇嫩的孩子的不必要的担心，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大笑着，欢跳着，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全不管理查德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法。他搞这次出游，也许是为了考验我的身体耐力。假如他真的是这么聪

明，设法在我们之间建立良好关系，那么他算是选对了方法。这次出游之后，我不再那么拘谨，我们之间的聊天也更有意义了。这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啊，为了建立这种关系而冲破严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许是对的。

理查德从未教过我关于从事秘密工作的规则和理论。为了对同志们的生命负责，别人的经验也是有用的，但是责任心本身给人的教育最为深刻，想到他们和自己的安全，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理所当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虽然没有人教，我同样也懂得，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在与理查德谈话时我发现，他对我与我们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尔特、威廉律师、伯恩施坦、温格伦·施特恩伯格、普劳特等进行的某些谈话是感兴趣的，于是我便有目标地邀请客人们来。只要理查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愿意这样做，从他的面部表情我会发现，他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就这样，我通过他的举止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驾驭自己，只要他认为重要的，我就能习惯地采取恰当方式与人们谈话。即使他不谈，我也明白这对于他是有用的，现在我可以谈，我了解我们的“机关”了。也许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情报，他自己有许多更好的联系，但是也许能形成一幅画面，我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估价，对他们的看

法的估价，也许会偶然对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价值。

我也很快认识到，对于理查德来说，光事实是不够的。一旦我掌握事实不多时，他便会问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说：“好，好，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我要再强调一次，后来也不曾有过我知道自己为谁工作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只了解工作当中的那些事情，随着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来越清楚。我相信这很能说明理查德和他的同志们的工作力法的特点。当然，这期间我的求知欲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烦恼。我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些出色的共产党人圈子里工作而感到幸福，后面我还要讲述别人的情况。我通过他们的榜样学到许多东西，他们并未有意识地教我。秘密行动成了第二天性，因为我要保护的那些同志不断地受到威胁，我以同样的直觉守护他们，像守护我的小儿了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奇异的比方。犹如孩子的轻微哭声唤醒我一样，在同志们周围哪怕有最微小的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事情，都会引起我的警惕。

三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准备去牯岭度过最炎热的时间，牯岭坐落在江西省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里为我们租了一栋小别墅。本来宋庆龄也想一同去。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她是已故中国总统孙逸仙的夫人。他死后她在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

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经常与艾格尼斯一道去她那里，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她的生活并不轻松，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嫁给了蒋介石的财政部长。由于政治观点的缘故，她在她们那影响很大的家庭里是失宠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制的衣裳，我穿了许多年。后来她到底未去牯岭，理查德不赞成我在公开场合与她在一起。



[1] 鲁特·维尔纳女性友人之一。

[2] 丁玲在“文革”中长期被关押，今天她是中国在世的最伟大女作家。不久前我收到她的几本新书并有题词：索尼娅留念，丁玲。

[3] 马利克出版社创立于1917年，柏林，领导人是德国作家维兰德·赫茨菲尔德，曾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做出重要贡献。——译注

[4] 现译名凯绥·珂勒惠支，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其作品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最早由鲁迅引进中国，其作品在创作思想内容及表现技法上，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木刻青年，间接推动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

[5] 政治性错误。

[6] 罗尔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1903-1980），鲁特·维尔纳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建筑设计师，在沪任职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7] 鲁特·维尔纳第一任丈夫罗尔夫的男性友人。

■ 宋故居纪念馆开展“爱心一日捐”活动



新年伊始，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开展了“爱心一日捐”活动，共募集善款3650元，纳入纪念馆的帮困基金，统一用于帮助本单位困难职工和助学对象，体现了单位和个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故居大家庭的温暖。

■ 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一行参观宋庆龄故居



2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部长童刚一行，在市文物局、区文管办同志的陪同下，前来宋故居参观指导。馆长金晓春、副馆长邵莉等陪同参观。

■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一行参观宋庆龄故居



2月17日上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一行在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董玲陪同下，前来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观指导。副馆长邵莉及接待人员陪同参观。

■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积极参加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3·5学雷锋”前夕，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主动与所在社区康平居委会联系，积极组织安排职工参与康平社区“3·5学雷锋”系列活动。故居员工不仅到康平居委会参加了“清洁家园”行动，还参与了社区组织的爱心义卖活动，所得善款将全部捐献区红十字会。

■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接待办主任李玉民一行参观宋庆龄故居



3月16日上午，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接待办主任李玉民一行在上海市接待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来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观。

■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中国故事——上海博物馆优秀讲解案例展示活动”中勇创佳绩



4月1日下午，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选送的专业讲解员杭垚、学生志愿者张喆浩在上海市文物局主办，上海自然博物馆承办的“中国故事——上海博物馆优秀讲解案例展示活动”决赛中分获专业组、学生组二等奖。

■ “努力惜春华——丰子恺儿童漫画展”隆重开幕



5月16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与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联合推出“努力惜春华——丰子恺儿童漫画展”。展览展出丰子恺先生不同时期创作的儿童漫画30幅。《两小无嫌猜》、《新阿大》等作品均为丰子恺先生的代表作。

■ “知音雅汇——宋庆龄、周小燕、蒋英珍藏唱片展 唱片文化与上海系列讲坛”在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举行



6月10日，正逢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与徐汇区文化局、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钱学森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知音雅汇——宋庆龄、周小燕、蒋英珍藏唱片展暨唱片文化与上海系列讲坛”在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隆重举行。本次展览我馆展出的唱片都是宋庆龄生前购买和收藏的，有些还与她的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晓春馆长致辞，希望通过本次展出，能让观众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位20世纪的伟大女性。

■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2017年度市内巡展《宋庆龄在上海的足迹》正式启动



4月22日，上海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2017年度市内巡展——《宋庆龄在上海的足迹》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正式开展。本次巡展同时充分发挥我馆作为上海市爱教基地、上海市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作用，与高中生社会实践服务相结合，动员各校“宋庆龄班”的同学们参与到本次展览的布展、撤展、讲解等各项工作中。我馆相关工作人员在南洋模范中学召开了巡展启动会暨展览讲解培训会，来自全市10所“宋庆龄班”所在学校的50余名高中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巡展还陆续走进市二中学、市三女中、西南位育中学、市西中学等十多所“宋庆龄班”所在学校展出，历时6个月。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荣获上海中学生“进馆有益”微论文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



6月27日下午，由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主办，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指导的“上海中学生‘进馆有益’微论文征文活动2016年总结暨2017年启动大会”在大境中学举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荣获“优秀组织奖”。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党支部与车管处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活动



在庆祝建党96周年之际，为更好地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党支部与车管处党支部开展结对联建活动，参观了上海汽车集团临港生产线以及上海航海博物馆。通过这次共建活动，党员同志们开拓了视野，增进了交流，增强了对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支部之间加强了联系，联建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进一步创新联建方式方法拓展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在庆祝建党96周年之际，为更好地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党支部与车管处党支部开展结对联建活动，参观了上海汽车集团临港生产线以及上海航海博物馆。通过这次共建活动，党员同志们开拓了视野，增进了交流，增强了对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支部之间加强了联系，联建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进一步创新联建方式方法拓展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宋子文外孙冯英翰一家前来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观



7月6日下午，宋子文外孙冯英翰携妻子、女儿在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宋时娟副研究馆员的陪同下前来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观。

■宋庆龄故居荣获2016年度“家庭护照”多项荣誉



2017年8月，《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社会实践基地家庭护照2017版》启动仪式在江桥万达广场举行。

仪式全面回顾从2012—2016年期间“家庭护照”相关工作的进展，并对2016年度优秀场馆进行表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作为家庭护照的成员单位之一，同时荣获了“2016家庭护照最佳服务场馆”、“2016家庭护照最受好评场馆”、“2016家庭护照最具人气场馆”称号。

■倪一飞局长调研宋庆龄故居保养维护工程筹备情况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拟于2018年开展故居保养维护工程。8月24日上午，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倪一飞同志来馆就工程前期筹备推进情况进行了调研。局办公室主任蔡伟、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陶竦及局房设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接受市文广局文物安全检查



8月30日上午，市文广局副局长王玮、市文物局副局长

褚晓波等一行在徐汇区文化局党委副书记欧晓川等陪同下来到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检查文物安全工作，重点检查了《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文物建筑电气防火导则（试行）》等的落实情况。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讲解员荣获“上海市徐汇区旅游行业演讲比赛”一等奖



9月6日下午，在由上海市徐汇区旅游局联手徐汇区总

工会共同主办的“上海市徐汇区旅游行业技能大赛”上，我馆讲解员赵雪获得演讲比赛第一名。我馆也因积极的参与和优异的成绩喜获本次大赛“优秀组织奖”。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到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检查文物安全大排查情况



9月7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带领工作组在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徐汇区委宣

传部部长吕晓慧等的陪同下，来到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实地检查文物安全大排查工作落实情况。

■倪一飞局长调研宋庆龄故居维修工程推进情况



10月12日上午，局党组书记、局长倪一飞同志来到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就故居明年的维修工程前期筹备推进情况进行调研。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陶竦、局房设处有关负责同志一同参加调研。会后，倪一飞局长还现场查看了筹备中的《风雨同舟五十载——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宋庆龄》文物史料展布展情况。



主 编 金晓春
副主编 邵 莉
编 委 麦灵芝 蒋慈华
执 行 郑培燕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

内部交流